



中评周刊 | 第 97 期目录

专题 | 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 [研讨会部分主题演讲]

1. 任剑涛：中国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变 P. 2
2. 贺卫方：我与司法改革：十三个时刻 P. 5
3. 萧功秦：从新权威主义看中国改革 40 年 P. 10
4. 荣剑：新权威主义理论至多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 P. 16
5. 讨论实录：「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 P. 21

观点文章

1. 盛洪：社保不是税 P. 29
2. 张曙光 张弛：经济增长逐季下行 实现稳定相当艰巨
2018 年第 4 季度及全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P. 34
3. 哈耶克：开放社会中的小群体 P. 48

随笔散记

1. 盛洪：养其身以有为 | 《天则年鉴》(2018 年) 序 P. 50
2. 李南央：女儿说李锐 P. 51

读书

1. 周保松：苏格拉底式的一生——诺齐克的哲学人生 P. 68

审美苑

1. 林蔚昀：猴子轻柔的铁链声 | 从辛波丝卡的诗，看波兰百年来的历史难题 P. 77
2. 布罗茨基：怎样阅读一本书 P. 84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89

订阅 | 往期下载 P. 91

任剑涛：中国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变

[任剑涛 政治学学者，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1 月 5-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任剑涛教授

苏珊教授的主持非常无政府（笑），不容易。那我就自作主张，按照顺序先讲一讲。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一下关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些想法。我主要想讨论中国改革开放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在结构变化上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在论述上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苏东的改革。两者走到 1980 年代后期，苏东和中国共同遭遇危机。但为什么中国能够度过危机走到今天？我对之的分析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的宏观避险能力使它走到今天。第二，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上富有成效，主要是中观着力，就是宏观制度绝对不变，但对中观运行体制进行大幅调整。第三，最直接的就是在微观领域致力搞活局面，使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局面成功出现。

这三个层面的大致含义是什么呢？所谓宏观避险，指的是中国政治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理念不变，规避掉这两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就是基于这一不变，是其刻意避免宏观风险的结果。所谓中观着力，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运行体制安排上，进行了大力调整。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大的着力点。在这个着力点上，可以说有非常大的腾挪空间，或者排列组合可能。正由于这样一种排列组合上的不断调整，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在 GDP 的增长上，有一个亮丽的体现和持续性的表现。所谓微观搞活，指的是在改革开放具体的办法上、内

容上和措施上，采取围绕效果进行改变的灵活做法，因此使得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此三个现代化特征显著的改变，构成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的标志。尽管间有挫折和起伏，但是一直延续了差不多 40 年，实现了 GDP 的高速与持续增长目标。

我先从第一个方面分析。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国家高层就确定了两个不能放弃的原则，一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一个严格的政治规定性。二是在这个政治规定性下面，申述了四项基本原则。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这涉及到中国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它们是构成中国的两个支撑点。在国家领导人看来，如果这两个支撑点一动摇，国家的基本秩序就难以有效维持，国家很可能陷于混乱，权力便会彻底重组。中国近 40 年中，大家都知道，在这两方面没有任何改变的空间和可能。因此在宏观避险上，划定了两条被中国大陆所称的“红线”：凡是主张动摇宏观制度，就处于敌我之分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是从来都是非常决绝的。

在将改革限定于既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之后，设定了三个改革进路：一是国家政策围绕经济增长的积极调整。这类调整一直处在左右摇摆的状态，因此得随时随地控制改革进程，以求在宏观避险上真正避免出现大的风险。二是围绕限定性改革进行人事调整。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讲话时强调的，“不换脑子换位置”，任何人不能触碰前述两个基本原则，但又必须积极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失去官位。三是不断对改革自身加以调整，在左右摇摆之间，改革本身不断适应形势地展开。这是中国改革具有强周期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宏观避险，所有宏观改革便不成其为改革的主题。改革在哪里寻找改革契机，才能够获得它的正当性和时效性呢？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机制的运行思路。这是第二方面要分析的问题。各位都非常清楚，中国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的调整上。所谓政府职能调整，首先有两个边界是不能更动的：一者，政府的结构是不能触动的，这是中国政府越做越大的缘由。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社会福利都囊括在自己的事务范围。二者，与政府紧密的边际关系不做根本性变动。比如党政关系，就一直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但可以借助一些可以调整的选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中间最重要的选项就是政府职能的调整——如果说政府此前服务于政党的阶级斗争目标，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一定要服从政党的经济建设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恰好说明这一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向的最直接改革任务，就是调整政府本身的狭义执行权或行政权，促使政府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这种转变催生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县域竞争。这种普遍竞争，使得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能够在整个行政系统中确立起来，撬动经济机制的高速运转。

围绕政府责任的调整，从农村体制开始，到城市体制，再到科技体制，进而到教育体制等等，统统进行了调整。政府自身经过五轮大的改革，最厉害的是朱镕基总理在任的时候，将政府职能和人员同时减少 50%。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中观着力，可以说是中国改革一个最值得分析的问题。

题。中观改革往往是体制调整，并不必然地保证 GDP 和相应的社会各个部门显示出它的活力。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转变，最吸引眼球的是微观搞活。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微观搞活，可能是改革开放最具有收效和兑现改革目标的方面。什么叫微观搞活？就是改革开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的做法展开，对经济增长怎么有效就怎么行动。这里无法对之进行详实分析，仅举两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晓。第一就是曾经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时候，成功引进价格机制。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引进价格机制，在苏东是非常大的难题。各位都知道，苏联的列别尔曼讨论，证明价格机制是为苏东改革一大障碍。国有企业能否盈利的问题，一直阻碍苏东改革的深度推进。这个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等编译了一本《列别尔曼讨论集》，对中国是否放开价格的微观领域改革，发挥了推进作用。远的不用说，把话收拢回来说结果：大家知道，当今中国国有企业对微观价格手段的运用，可能对全世界的国有企业都有些匪夷所思——看看三桶油，或者国有交通、通讯公司，可以说他们对价格机制的敏感与控制，远远强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当然更强于计划经济下所有的国有企业。正是因为价格机制的激活，使国有企业完全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能不能盈利的障碍，也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能不能“剥削”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教条和经济教条。因此使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的同时，又以价格机制的灵活调整来占据庞大的市场份额。这使得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常常在政策支持、资源份额和价格机制上都无法与国有企业竞争，而使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利器”。这样一个调整过程，可以说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因为在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做到。

第二个微观搞活的例子就是教育。1983 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年龄不超过 50 岁的人，可能不会觉得这一微观调整有什么重大意义。像我们这一批新生代的大学生——我与改革开放同龄，1978 年进入大学——我们特别体会到这一调整的惊心动魄。我上大学三年级的学习，哲学教材还说电子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见当时教育还是比较封闭的。正是教育的三个面向定位，使整个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出现了价值强控下的知识调整空间，让大学教育可以围绕经济发展去迅速改进，让知识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动能。

中国改革开放确实催生了迅速发展。当然有其利就必有其弊，过分强调宏观避险的结果，就是改革走到今天，遗留下来的都是最艰难的宏观改革难题。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体制上进行的调整，即那种不断的腾挪或者排列组合，绩效已经明显衰变。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哪里呢？很显然都在宏观领域。这意味着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势必经过最艰难的宏观历险到宏观变革，才能有效进行推进深水区的改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返回目录】](#)

贺卫方：我与司法改革：十三个时刻

[贺卫方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1 月 5-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贺卫方教授

虽然时间限制非常的残酷——每个人的发言只有 10 到 12 分钟——但是我还是要表达一下自己能够到这儿来的特别兴奋的心情。我 22 年前曾经在哈佛法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今天在会场上又看到相识的几位教授感到真的非常高兴。

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比较符合刚才任剑涛教授的主张，他建议通过微观的角度来推动政府的一种更为宏观的改革，我今天的话题比较微观，就是司法制度的改革，原来我的题目可能更窄一点，就是通过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来推动一个更加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出现。但最终还是确定扩大一点，讲一下自己作为一个亲历者，参与过去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的经验和体会。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现在非常尖锐。我倒不觉得有那么敏感，贸易战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但又不只是经济问题。一百多年前毕业于哈佛一位重要学者，他叫 Hosea Morse，中文名字叫马士（他实际上是费正清先生的老师。费正清向他请教过许多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在他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史》中展示了清末中外贸易中的种种摩擦。情况表明，贸易战其实表面上是贸易战，实际上是法律战，或者不同制度的冲突。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如果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对于贸易方面的纠纷以及包括刑

事案件等其他一些冲突进行公正的裁判，能够达到一个底线的公正，那么，所谓的鸦片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会非常顺利地就走向了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

所以，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不断地通过经常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解决各种争端——今天虽然不大可能发生，但谁知道呢——很明显，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税高低的问题，而是双方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落差，它跟中国是否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息息相关。1990 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国民也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于司法制度的普遍而强烈的意识，就是说，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但是却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结果还是无从保障基本的权利，也难以约束政府的强权。这不仅仅是我们涉及到对外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本国的国民，我们是否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能够很好的裁判纠纷，能够处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能够给我们给国家带来一种良好的秩序和自由。

我个人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热情地参与到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的过程之中。下面我会通过 PPT 图片展示一下我参与的一些事件和时刻，原谅我，也许大家会多少感到多少有点自我炫耀的意味，不过，其实从后来的结果看，这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个人史。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的，我越来越不像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 man of action，经常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行动者，或者目前在中国变得有点贬义的身份——公共知识分子。以下容许我最简短最快的讲一下我这些年做的一些事情。

中国的司法改革的序幕大致上是 1993 年之后拉开的，不久，法律职业者素质的问题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1995 年我开始倡导我们应该引进一个更加合理的司法考试（Bar Examination）制度，以及后考试之中的培训，叫司法研修制度。这是我考察日本司法研究所之后发表的文章，倡议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候选人共同通过同一考试进入法律职业的考试模式。（编年文：“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兼论我国的司法考试及司法研修制度的改造”，载《中国律师》1995 年第 10 期；增订版《南京大学法学评论》同年秋季号）。

1997 年的我开始论证法官为什么不应该穿警察一样的衣服，而应该穿法袍(robe)。（编年文：“正义的行头”，载：《工人日报》1997 年 7 月 12、19 日，8 月 23 日，9 月 27 日。）大家都知道，到了 2002 年前后，中国的法官们终于穿上了法袍，虽然这款法袍的设计很难看，不过，那却是跟从前的军警式制服性质完全不同的职业服饰。

1998 年 1 月 2 日，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这是我在这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上的第一次亮相。文章对政府把复转军人转到法院去做法官的惯例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军界的一家报纸对我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攻击，连续四期的报纸，第一版满版都是这些批判我的文章，让我获得了超越法学界的名声，尤其是在军界，成了一个名人。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司法职业化的关注。

接下来，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很多涉及司法改革的文章。这是 1999 年的一篇，对于审判

委员会这种制度设置提出了直率的批评，我认为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法官的独立权力，弱化了他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编年文：“似是而非的审委会保留论”，《南方周末》1999年3月12日）。

世纪之交的那几年算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黄金期了。2001年国家建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第二年就有了首次司法考试。我觉得这是司法改革方面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成就之一，我也非常愿意推动一下这个制度如何设计得更加合理，连篇累牍地写了好几篇文章。（编年文：“不进一个门，不是一家人”，《法制日报》2001年7月9日；“统一司法考试的方法”，《南方周末》2001年7月19日；“建立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24日）。

随着改革以及对改革的讨论的深化，一些体制性的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起来。2002年我的这篇文章让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非常不高兴。（编年文：“论最高法院”，《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23日。）这篇文章提到了最高法院不仅是最高司法机关，而且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应该对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行制衡，并成为宪法的守护者。最高法院当时院长还是一个很好的院长，叫肖扬，他也访问过美国，愿意推进以专业化为目标改革。但这篇文章还是让他有些不快，他责怪报纸的主编说，你们怎么敢发表这样的文章？在我们最高法院自己办的报纸上出现这样的论调，别人会觉得你是借学者的嘴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年之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文章了。这是很遗憾的，因为在这里发表文章能够跟法官们形成一种很好的互动。

在这样的局势下，到2003年，我们曾经为河南省的一位女法官叫李慧娟而欣慰，为她的遭遇进行过热烈讨论。（编年文：“人大监督与法官独立审判”，《法制日报》2003年11月20日；“问题一箩筐”，《南方周末》，日期同上。）李慧娟法官在一个案件的判决中明确宣布地方立法因为与全国人大的一部法律相冲突而无效，结果她却因此遭到免职处分。这个事件涉及到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对于一个地方的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或者说我们能否促成在一个在较低层次上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那样的里程碑案例。《纽约时报》也对这个案件进行过专门的报道，让这个事件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当然，结果还是无法在中国确立法院对立法行为作出违宪审查的体制。

接下来就是2004年我们参与修改法院组织法的故事。（编年文：“人民法院组织法建议稿解读”，《新京报》2004.12月4日。）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法院组织法（学者建议稿）里，我和张志铭教授主持的起草小组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即1）法院组织的法定化；2）法院设置应有助于法律准则的统一；3）法官个人独立，不受来自法院内外权力的干预；4）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不过，这份建议稿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法院组织法修改时，我们倡导法院的设置应有助于法律规则的统一，是考虑到中国政府体制设置的一个巨大缺陷，那就是行政区划不只是行政权力的划分边界，而且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高居于政府权力之上的执政党权力的划分也都与行政区划完全一致，四权重合，密不通风；党委书记，一手遮天，这是导致国家治理方面许多弊端的根源所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倡导说在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

建立一种跟行政区划不同的司法区划。当时正好民政部传出要在调整行政区划，要把中国划分为五十个省级单位。我建议顺势确立不同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边界的高等法院的管辖范围，让每一个高等法院管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级单位。（编年文：“司法归司法，行政归行政：从‘50省’行政区划传闻看司法独立之条件”，《中国法律人》2004年第2期；“借行政区划改革之东风设置司法区划”，《东方早报》，2005年9月10日。）不过，民政部很快就表示，这个方案不过是一个“学者建议稿”，十年之内不会进行这种改革的。关于这个倡议，在2013年又有了一些进展。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我又借机对这样的司法管辖制度提出了一些构思。（编年文：“司法区划的构思”，《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2014年3月。）不过，迄今为止，这方面还是没有多少进展。

这些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司法冤狱，尤其是多宗涉及死刑的冤狱。2005年，媒体揭露了聂树斌案，一个真正的杀人犯落网，证明了十年前那个叫聂树斌的年轻人是被法院冤杀了，执行死刑时他还不满21岁。我对这个案件一直跟踪呼吁，像BBC的这篇报道说的，我为此已经发表了数十篇的文章，要求相关司法机关尽快重审。经过很多人的艰苦努力，到了2016年年末，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了，最高法院宣布聂树斌无罪，但人的生命无法挽回。（编年文：“辩冤白谤的机制”，《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谁来给聂树斌们洗冤？”《南都周刊》2007年11月9日（No.168）；“聂树斌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诿”，《南方周末》2011年9月22日；“聂树斌案：迟到的正义”，《明报》（香港），2016年12月13日）。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反思和推进的是，如何尽可能避免这类错案的发生，还有一旦发现可能的冤案，怎样提高平反昭雪的效率。

中国司法的一个严重弊端在于法学术语所谓“法律渊源”的不确定性，即法官在判决案件时所适用的规则难以预测。2008年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王胜俊先生居然提出来一个荒唐的观点，说是否判决一个人死刑要参照“人民群众的感觉”，令人哭笑不得。恰好他又主张司法要祛神秘化，我就发表文章跟他商榷，说他关于死刑判决的观点正是最严重的司法神秘化。（编年文：“司法神秘化如何祛除”，《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不用说，直到今天，中国法院在这方面仍然是沉痾难愈，在一些敏感案件方面甚至达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同样是在2008年前后，也许是由于司法改革持续多年，但是司法公信力却无法树立，于是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司法专业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主张通过司法民主化的建设推进司法公正，引进英美式陪审团制度也成为一些学者的主张。我认为司法民主化其实是一个不通的路径。大家知道，中国的立法制度没有依据民主的逻辑建立，整个政治体制也没有实现民主化。政治制度与立法体制都不民主，国民也缺乏民主实践的训练，单摆浮搁地在司法领域搞民主化，结果会怎样？无非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那种混乱和更具压制性的陪审制度而已。不仅如此，外行介入司法的一个前提是司法非常高度专业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法官专业化程度很低，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过是陪审员的水准，

再引入陪审团，那真是怪诞莫名的一种架构。所以，我的主张还是要在各个环节上继续推进司法的专业化，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不二法门（编年文：“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

最后一个事件涉及到重庆，在薄熙来治下的这座城市里，从2008年开始，薄熙来和他的政法助手王立军发起了一场所谓“打黑除恶”的运动。他们完全无视法律的正当程序，突破实体法上的基本规则，并且把律师作为他们这种粗暴执法行为的障碍，把打击的对象延伸到律师们的身上。这种现象甚至成为薄熙来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其实无非是让政治和法律体制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到了2011年，坊间传说薄熙来很可能在中共十八大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政法委书记。法学和法律界的许多人都对此忧心忡忡，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真是后果不堪设想。2011年4月，我忍无可忍，发表了一封致重庆法律界的公开信。（编年文：“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东方早报/理财一周》2011年4月15日。）虽然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的命运而言，好像是反对“重庆模式”的力量取胜了，但实际上完全谈不上是一场胜仗。后来的情况表明，过去重庆是重庆，中国是中国，现在，中国仿佛变成了扩大版的重庆。

所以，到2018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回首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包括过去司法改革的这种左冲右突、难破困境的现状，不免感慨万端。也许应该把过去将近两百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国家如何建立一种公正的司法制度，是一个持续性的难题。我们究竟应该确立怎样的一种方向，依照怎样的一个模式去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以便既能够解决内部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问题，同时也能解决涉及到国际关系上的某些困难，这需要一种通盘考量和决策。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突破之外，我觉得通过法院以及检察院组织法的某种技术性的突破也可能是一个方向，怎么说？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国家能够设置一种合理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立法权以及执政党的权力进行制约，确立违宪审查体制，通过独立性和专业化的建设提升司法权威，与此同时，合理地确定中央与地方在各种权力之间的界限，有制衡中央的地方自治，又有协调全国的司法统一，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在司法这个领域打开一个真正改革的通道。

毛寿龙：回到哪了？

贺卫方：回到意大利。 🇮🇹

[【返回目录】](#)

萧功秦：从新权威主义看中国改革 40 年

[**萧功秦** 著名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1 月 5-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萧功秦**教授

我想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视角，来解释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并展望一下未来前景。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当我们考察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时，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一般都会直接采用西方多党民主体制，但结果都无法避免持续的政局动荡与乱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强人，他用铁腕稳定了社会秩序之后，一般都会采取吸引国外资本，发展本国实业，引进外国教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引进国际通行法治等等举措。随着时间推移，市场化的经济就会得到发展，社会结构也会随之转型，中产阶级也会广泛形成，这就为该国走向民主化创造了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可以给新权威主义体制作这样一个定义。那就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在直接推行西方民主体制失败以后，作为多党民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

这是一种可以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发展模式。虽然，新权威主义体制并

不就必然地转向向民主体制，但它却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必须经历的先期发展阶段与前提条件。有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地都曾经有过这种模式，其中以一些东亚国家，例如韩国最为典型。当然，世界上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新权威体制。

下面，我要从新权威主义的视角，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从政治上说，实际上走上的，正是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首先，是文革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文革灾难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钟摆效应，深受文革迫害的元老派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了中国的政治，中国人民大众、知识分子以及包括元老派的政治精英，从极左乌托邦的迷梦中苏醒了过来，并从常识理性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反思。《邓小平文选》的精华，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话，一，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二，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经济，三，要发展经济就要改革开放，四，要改革开放就要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四句话中的常识理性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内涵。它体现了两个界线。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有制，都可以借鉴采取。世界上任何所有制，只要能让人们生活好起来，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就是按这两个界线来引导中国现代化的。

这两个界线合在一起，逻辑上就会勾划出一种以共产党铁腕为基础的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中国模式就是世界新权威主义谱系中的一种新类型。1978 年以后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的引导下走上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1989 年的天安门风波，邓小平用铁腕让激进自由派边缘化，1992 年，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让党内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保守派边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邓小平的左右开弓，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在 1992 年正式形成了。有位前国家领导人回忆起他向邓小平解释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时，说“新权威主义就是通过集权稳定政治，发展经济”，邓小平当时回答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此后，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他在当政的十多年里，实现了包括分税制、管理层收购，以及加入 WTO 这三大改革。胡锦涛当政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跨越式发展。

概括地说，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奠定了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基础，江泽民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了经济转型，胡锦涛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 GDP 从 2002 年的 12 万个亿，到 2012 年的 50 万个亿。中国的经济从人均 250 美元到现在的人均接近 9000 美元。GDP 在 40 年的时间里面提升了 35 倍。在孔夫子以来的 80 代人当中，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这么大的经济飞跃，毋庸置疑，中国的成功与新权威主义这种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柔性版的新权威主义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与历史经验上说，中国有可能通过江胡这种柔性版的新权威主义，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民主体制，我曾经设想过这一发展逻辑路线图的五个阶段，那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契约性规则与法制文化形成——市民社会

与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实上，江胡时代也是朝着这一方向在努力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标志着执政合法性从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想承诺，转向以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实效合法性，胡锦涛提出的“基层民主选举”，“和谐社会”，与“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都体现了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民主发展的努力。

然而，柔性新权威体制出现了发展困境。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化是对原来的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进行放权让利的方式来实现的，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可以由放权者自由选择的，这样一来，受益者对放权者的私下回报，就形成利益合谋与权钱勾结。例如，某地某领导一个电话，让某开发商获得一块地的批租，就可以得到后者给予的几千万元人民币的回报，这是中国腐败的最主要形式。在原有的集权体制下，“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中国的腐败就形成巨大的黑洞，再加上市场经济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公，更使问题雪上加霜。对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当政者又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来予以应对，号令不出中南海。在中央出现了“九龙治水”式的寡头化。致使利益固化的利益集团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并通过关系关系网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如果按照江胡柔性新权威主义原来的发展逻辑，直接发展民主政治的话，政治风险就会大为增加。如果处理不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出现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势力在扩大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在中国迅速膨胀，而这两种势力各自都掌握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它们在民间都有强大的支持群体与思想文化基础，并且都可以把复杂的现实问题，“打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极端左派会用文革口号对社会进行“反资”动员，极端右派会提倡多元民主革命，这就会形成广场效应与广泛的街头运动。广场上就有可能出现左右之争下的社会撕裂，中国式的“红衫军”和“黄衫军”就会出现。中国就会陷入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政府也会变成进退两难的弱势政府。

对习近平新政的新解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强硬版的习近平新政得以出现的政治逻辑。习近平新政的主要内容，第一点，是动员共产党的传统组织资源，从党政分开变成了党政合一，用党领政，当政者把这个组织资源看作是执政党的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把它运用来作为强化国家治理的组织力量。第二点，就是进一步强化传统意识形态资源与革命符号资源，来支撑执政党的组织动员力，且顺势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与党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以此来避免“九龙治水”。第三点，是通过一系列禁令，包括不准提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权贵资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来抑制激进的左与右翼的政治参与的膨胀。通过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与话语权，来保持现行秩序的稳定性。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强化，使执政者形成一种比过去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克服了前届领导时期的政出多门的多元现象，并通过这种强势政府来打击腐败、进行国家治理。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政目标，并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他提出的“中国梦”，是旨在实现“全民小康”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他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两个“不忘初心”作了权威的解釋，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人制建立平均主义社会的初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权威文献中，通篇没有提到消灭私有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没有提到暴力革命，没有提到世界革命，提到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提到的是“一体化就在那里，谁拒绝它，它就拒绝你”。据我所知，国内许多原教旨左派对讲话极为不满，甚至提出抗议。从十八大与十九的决议与各项文件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举措，合起来有近千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新阶段，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说，正如我们遵从龙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一样，新一代的政治精英不再拘泥于经典中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人民性”与时代性的实质。其中某些内容则根据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予以扬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新时代，可以理解为“用毛泽东的办法，做邓小平的事情”。在四年以前，我写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 1.0 版本，那么习近平就是 2.0 版本。通过一种强化版的新权威主义，来实现邓小平的既定目标。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强化版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那就是，当政治精英更大力度地运用传统革命的意识形态资源与组织资源，来强化治理能力时，这些传统资源中的一些负面性的、消极性的、早已经被改革开放扬弃的因素，却有可能被重新激活，形成“泥萝卜效应”。这些负面性因子，从“假死状态”中苏醒过来，会在一定条件下死灰复燃，会形成“死的抓住活的”。它们会对我们健康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干扰与冲击，并影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这种极左文化借此在社会上重新被激活的现象，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 某些地区曾经发生的“野蛮拆迁”、“暴力迁坟”的简单粗暴，就是过去运动式的政治的死灰复燃。

—— 极左思潮在近年来在社会上某些人群中的再次膨胀。某极左团体居然在庄严的大会堂里召开带有文革符号的造势会。某些左派大学生手捧经典，去动员劳工。有人公开打出文革口号反对改革开放，一些极左的机会主义者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时甚嚣尘上。

—— 民间与地方上出现个人崇拜现象。这种政治文化遗存，一旦被激活，会引发民间新的造神运动，并借此否定改革开放。

—— 中国国力的增强，反而在某些地区进一步助长经济上的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式的高指标与浪漫心理。

—— 一旦社会横向调节功能被传统式的垂直管控功能全面取代，权力高度集中会带来的权力制

衡机制的缺失。这些也会带来纠错成本的提升，社会微观创造活力与竞争力的削弱。

——有人用左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复杂的互动关系。当你把对方解释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也会刺激对方用他们的冷战思维与陈旧意识形态来的看待中国，把中国看作挑战美国第一大国地位的“红色帝国”，形成彼此误解迭加产生的恶性互动。

当然，以上列举的这些左的思潮的激活现象，并不是社会主流，但仍然值得高度警惕。可以预料，一旦今后中国经济发生困难，出现失业潮，极左思潮造成的以上这些“社会干柴”，就有可能一触即发，在社会上燃起反对改革开放的熊火，形成文革复辟主义。中国将有可能被引向文革式的新极权主义（New totalitarianism）。

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左的东西来抑制右，可以收一时之效，但“性价比”不高，处理不好，左的东西未必能压住右，反而会“扬汤止沸”，让社会上反改革的思潮火上加油，不知不觉中，文革的魔怪就会从潘多拉盒子里逃了出来，结果是引火烧身，危及改革本身。如何避免革命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重新被激活，导致向旧体制的复归，这将是治国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我看来，邓小平思想的内核，实质上也是“用毛的办法，做自己的事”。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用毛的办法”保护执政党的地位不容挑战，但他要做的事，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融入世界与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他是如何“用毛的办法”的同时，却能成功地避免“左”的干扰，并且取得铁腕改革下的非凡成功的呢？在我看来，他的经验有三点。

第一点，**尊重常识理性**，就是让我们的思维摆脱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的教条，摆脱浪漫主义激情，摆脱宗教的信仰对我们理性判断的干扰，这就是用常识理性来作出判断。做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邓小平从来不受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他总是用常识作为判断的问题的内核因素。据李光耀回忆，一位欧洲领导人曾对邓小平说，“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儒家”，邓小平盯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不是那又怎么样？”在邓小平看来，西方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会以如此干脆的方式回应他。

第二点，要**尊重社会多元**，让经济多元、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以及思想多元，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贯性的条件下，能够真正起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均衡作用。

第三点，**尊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制度创新**，特别要尊重在问题倒逼的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制度要与时俱进。

常识理性与尊重多元的重要性必须充分强调，它们有利于新权威主义体制在多元信息的流通中，汲取新的信息与思想营养，保持对新思想的开放接纳态度。多元社会中形成的各种要素，将会不断地丰富新权威主义的合理政策输出，并自然形成这个体制的自我纠偏能力。所有这些，都会避免封闭性的集权的陷阱，增强一个体制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这样的体制将充满活力与生机，并能在顺应时代挑战过程中与时俱进，这样体制就是开放性的、有韧性的新权威体制。

只要新权威主义体制保持制度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与开放性，随着社会利益分殊化达到一定程度，单纯的一元性的整合，将不再适应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要，这就有了向本国特色的更高阶段的民主发展的巨大空间。我们应该有创造中国特色的民主新文明的开阔胸怀。

从新权威主义转向未来民主新文明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决不是对他国民主体制的简单仿效与移植，它是开放性体制在不断自我更新过程中的符合逻辑的历史演进的结果。换言之，新权威主义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多元化，势必形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与整合，需要契约性的协商机制，而民主是实现这种契约性协商机制的制度载体。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中稳步地迈向新的政治文明。

只要我们能根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中总结的这三大经验，来引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发展，就可以想象，新权威主义就可以不断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我们民族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迈向社会主义的新文明。■

[【返回目录】](#)

荣剑：新权威主义理论至多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

[荣剑 独立学者，北京锦都艺术中心” 董事长。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11 月 5-8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主题演讲修订稿，标题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内容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荣剑

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今天我获得了最后的一个发言机会。为什么我要说最后的一个发言机会？因为中国最近发生了一个“最后”发言的事件，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先生，在中国残联七大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我的理解是，这个最后的讲话是为了捍卫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作的一个绝地 fan ji。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他生前，是中国无可挑战的一个权威性的人物，但在他去世之后这么多年来，他的权威正在面临着挑战，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可能被 Dian fu，甚至已经被 Dian fu。这涉及到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要思想：中国最高权力配置中的权威主义是如何递减的，以及它在“新时代”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大致包含的内容是：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不被执政党公开认可的政治实践，的确贯穿着中国 40 年的改革进程，从邓小平改革的权威主义逻辑，到 Jang 、Hu 时代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再到“新时代”以来从权威主义回到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态——Dang 权主义。这就是说，在新权威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挑战，一个远比新权威主义对国家和社会更有控制力的 Dang 权主义，在肆意 qing ru 了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同时，还 qing ru 了政权（政

府之权)、军权和法权领域,从而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之争。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权力之争的时刻,回顾和反思新权威主义之争,是要在改革 40 年的终点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制度转型的下一个路径。

1989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由当时 ZGZY 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个副局级官员吴稼祥写的《为新权威主义壮行》,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我写的《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正是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巨大影响力,文章迅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争论,争论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泛。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刚才发言的萧功秦教授并没有进入到争论的核心层面。当然,我必须指出,他为这次争论作出了一个特殊贡献,他创造了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

新权威主义之争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 中国改革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改革应该采取一条什么样的路径? 1988 年上半年,最高领导层决定价格闯关,但没有想到的是,价格闯关失败了,随后就是推出了治理整顿的政策。实行治理整顿使得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停顿下来,执政党也不得不面临选择: 究竟怎么做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下去? 这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个就是吴稼祥所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主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最后过渡到民主宪政体制; 另一个就是我所阐述的民主主义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 30 年之际,也就是在 10 年前,吴稼祥先生曾对新权威主义之争做过一个总结,他认为这场争论是改革派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的争论,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是政治民主优先还是经济自由优先的问题。而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改革路径之争,实质是国家和社会之争,是国家主导的改革(以威权控制的方式)和社会主动推动的改革(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之争。刚才萧功秦先生讲到,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他说的这个情况的确如此,以我为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清除出大学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权威主义者的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萧功秦先生也没有获得一个更好的待遇,他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始终是处在边缘化状态。另外一个新权威主义人物吴稼祥的处境更难,他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威权政治的风暴席卷而来时,争论的双方,不管是新权威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都被这场政治风暴所淹没。这个共同的结局,并不是像萧先生所讲的那样,只是自由主义者被边缘化了,而新权威主义者则成了主导中国政治的主角。

因此,我在我的论文中有一个判断,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主张只是几个学者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安排及其运行的一个“事后”概括或总结——请注意这是“事后”,而不是“事前”来为执政党规划或设计一个新的制度。执政党从来就没有把新权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纲领,以此用来推进在集权政治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权威主义不过是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后来在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奇迹和改革成就,其实并不能记在新权威主义的账上,新权威主义的相关理论至多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从我的视角来看,比新权威主义更能有效地分析中国制度安排及其演变的概念,是国家主义。我是用绝

对国家主义和有限国家主义这两个概念，来判断中国的制度性质及其变化。从绝对国家主义走向有限国家主义，是邓小平改革的一个基本诉求，国家不断地从社会领域中退出来，让社会有自我发展的空间。而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就是 Dang 权主义正在力图把有限国家主义体制重新推入到绝对国家主义体制。这就是说，Dang 权主义所基于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正在吞噬新权威主义所基于的有限国家主义体制。

我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邓小平改革的权威主义逻辑，为什么叫权威主义逻辑，而不叫新权威主义逻辑？因为在新权威主义者的相关论证中有一个基本导向，就是认为在集权化条件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趋向于宪政导向的政治改革。现在可以认为，这是新权威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一个“宪政神话”。改革 40 年的历史证明了从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执政党所进行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绝对不可能主动走向一个新权威主义者所设想的民主化进程，这就是我说的邓小平改革的权威主义逻辑并没有“新”的导向的一个基本判断。邓小平体制和 Mao zedong 体制的重大差别在于，Mao 的体制是国家把社会的所有领域都控制起来，是国家对社会实行绝对的或全能的统治，而邓小平改革则促使国家逐步从社会领域中退出去。邓小平改革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不是通过加强个人权威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是通过个人权威来促使国家从社会领域中逐步退出。张五常教授曾经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改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表现在哪里呢？计划应该是有意识、有理念、有设计，但对邓小平来说，他从来就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完整计划，也始终没有体现出一个有明确理念主导的、比如说按照新权威主义理念主导的改革。科斯教授提到的中国的边缘革命，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其实是来自于农村承包制、乡镇企业、城市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这四个边缘力量。邓小平只是在两个关键点上，用他个人的权威来推动中国的改革。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在 80 年代批准了来自底层力量的改革，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在 1992 年，用南巡的方式来重启改革进程。可以这么说，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权威主义逻辑。

在邓小平之后，改革的权威主义逻辑是否还在？新的领导人还能不能享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这是我在论文的第三部分要分析的问题。我对 Jiang、Hu 时代的权威主义逻辑有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刚才萧功秦先生也提到了，Jiang、Hu 时期仍然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但是在我看来，Jiang、Hu 时代的 20 年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性是在不断的递减中，而他们的权力却前所未有地增长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于一人之身，这是 ZG 自改革以来头一回。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在不断地增长，为什么他们的权威却在递减？这是因为领导人权威是需要通过特殊机制才能够成长起来，通过战争或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权威。在 Mao 邓之后，不管是 Jiang 还是 Hu，根本不具有这么一个权威生长的条件。

在权威递减的政治逻辑下，Jiang、Hu 时期的最高权力的制度安排发生了分化，最高领导人不能一人 DC 最高权力而只能相对集权，并由于最高权力的分化而实际形成了一种政治的分赃制。政治分

赃制具有两个效果，从正面效果来看，它形成了 Guo Wu Yuan 的权力运行系统，相对独立于 D 的权力系统，总书记和总理分享党政的最高权力。中国黄金 20 年的发展，是这种党政最高权力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政治分赃制的负面效果是，为执政党的大规模腐败打下了制度基础。最高权力的分化并没有构成一种互相制衡的机制，而是造成了大家共同腐败的条件。尤其是到了 Hu 的“九龙治水”时期，最高权力分化导致最高权力失控，刑不上常委，腐败从上到下蔓延，形成无法控制之势。

Jiang、Hu 时代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腐败，这势必成为“新时代”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以什么方式来解决最高权力分化所导致的最高权力失控，并由最高权力失控所导致的严重的腐败问题，无疑是“新时代”领导人最迫切的任务。我的论文第四部分的题目是：“新时代”是重建新权威还是新极权？对此国内是有争论的。按照萧功秦教授说法，新时代是新权威主义的 2.0 版，而也有教授认为新时代是新极权。我对这两个看法都持保留意见。对新权威主义不用再说了，事实上在江胡时代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已经递减到尽头了。至于新极权主义，这是一个绝对国家主义体制，而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有限国家主义体制，市民社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还有相当的生长空间。正是基于国家还没有像 Mao 时代那样完全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因此，用新极权主义来解释或分析现有的制度安排的性质，缺少经验上的充分支持，有效性不足。我是用了一个“Dang 权主义”的概念，Dang 权主义肯定不是新权威主义的 2.0 版，也不是绝对国家主义意义上的新极权主义，而是可以视为向绝对国家主义体制过渡的一个新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

Dang 权主义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试图用 Dang 权来统治一切权力，甚至取代一切权力。加强 Dang 权，扩大 Dang 权，强化 Dang 国制度，进而是以 Dang 代国。重要标志是 Dang 权不仅侵入企业，加强党对国企领导，巩固党委书记在国企中的核心地位，使国企蜕变为党企；而且侵入了政权即政府之权，国务院系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被党权所褫夺，政权成为 Dang 权的附庸。同时，Dang 权完全控制着军权、法权之上。Dang 权对一切权力主体的统治，和全能主义的控制系统，最后有可能完全复归到一种绝对国家主义体制。

Dang 权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彻底堵住了公民社会的成长之路，严重威胁市民社会现有的发展空间和私人财产安全，而且全面进入到政权、军权和法权领域，彻底扭曲了原来长期形成的党政、党军和党法关系，完全破坏了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形式建制，Dang 权凌驾于一切国家权力部门，凌驾于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从而构成了 Dang 权与政权、军权、法权和民权的共同的紧张关系。这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它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并处在和所有的权力主体的对抗性关系之中，它因此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风险。这是我的一个结论性意见。谢谢大家。

补充部分：

我刚才讲到的 Dang 权主义有可能趋向于一个绝对国家主义体制，最终结果也可能导致清华大学

郭于华老师所提到的“党社会”的体制，也就是说，从“Dang 国”体制进入到“Dang 社会”体制。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是“Dang 社会”，因为市民社会这个领域还保留着，这是抵抗 Dang 权主义最后一个领域了，其他领域几乎都被消灭掉了。市民社会主要有两个权利，一个是财产权，一个是人身权。人身权利包括安全的权利、出国旅行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权利现在也开始受到了压缩，比如外汇制度正在限制公民外汇的汇出，现在能够感受到市民社会所承受到的种种压力。市民社会的 di kang 虽然看上去是无形的，不是有组织的，但肯定是决定性的。这一次 ZG 高层举行民营企业座谈会，就是来源于市民社会的抵抗。

谢谢大家。🍷

[【返回目录】](#)

讨论实录：「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

[本文为 2018 年 11 月 5-8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分会场之一）讨论部分，转载请注明]



2018 年 11 月 5-8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主会场现场

贺卫方：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时时感受到自己是在被控制被监督，每一个教授在上课的时候都发现有一个摄像头在对着他，每一个人都在被防范，比方说任何地方都充满安全检查的那种设备。我自己总觉得这样一种国家，不可能让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自己是一个特别需要去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要去做那些个不应该做的欺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想需要的还是如何去树立人的尊严。而尊严跟国家的权力之间其实是有些冲突，有些是非常明显的冲突。

问题一：用新角度看待改革中的铁腕政治

参会者 1：很高兴看到四位老朋友在演讲，我 5 年前曾经说这将是一个红色帝国的发展时期，最近这两年，我说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刚才发言者中有人也提到 Dang 权社会，把公民社会、人民民间自治压低到最低的程度，假设是新威权主义集权为主，一直往下发展，发展到了 GDP 超过美国。总体上看上去是一种经济成功，社会也相应地得到了某种好处。但是公民权利被压缩到最低点，这总体上看是一个好的结果，还是有巨大危险？谢谢。

萧功秦：我不同意用“红色帝国”与“法西斯化”这个的提法,来表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我认

为，中国改革时代的 Dang 权的加强，或者说是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的进一步调动，有其积极的现代化的功能意义。我可以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解释。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中的政治铁腕化，有一个主要功能，那就是为了防止“薄壳效应”。所谓的“薄壳效应”，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新名词，我指的就是后发展国家改革初期出现的社会政治参与集中井喷与爆炸现象。大家都知道，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火山喷发。传统型的专制集权国家在改革初期，一般都会出现开明宽松现象，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六恢复了三级会议，而这种宽松开明政策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会在受统治者中产生一种宽松预期，许多过去能表达或不敢表达的政治诉求，都会短时期内集中出现，形成政治参与的井喷，各种政治诉求会突然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这时的政府改革精英就会处于进退两难，一旦政治抗争者受到政府的抑制，就会产生政治悲情，革命动荡最容易在这一时期频繁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 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1901 年开始的清末新政，俄国的 2 月革命，中国八九之交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的专制型的体制在进入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薄壳效应”现象。

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在于，他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铁腕改革，避免历史上传统帝国的“薄壳效应”。这个坎过去从来没有人迈过，邓小平迈过了。概而言之，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克服了发展政治学上的薄壳效应。这是值得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

当然，我们在肯定改革铁腕的正面功能的同时，也要强调一定要避免出现“铁腕治国”出现的路径依赖。本来许多矛盾本来是可以社会横向的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的。但如果仍然沿用垂直体系的加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解决得不好，就会发生改革的倒退。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要克服“薄壳效应”，所以“铁腕”永远有理，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受“薄壳效应”的威胁，从铁腕威权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时候“薄壳”变成“厚壳”？由于时间有限，我在这里无法展开，简单地说，新权威主义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发展经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增加社会共识，让中道理性、温和宽容与妥协成为社会思想与价值的主流价值，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全面进步，极端思维的边缘化，“薄壳效应”就会自然消逝，走向更高阶段的本国特色的民主时代就会到来。直到那时，良性的威权铁腕，就会让位于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主新文明，它作为社会新文明的助产婆，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而淡出历史。

提问：谢谢各位教授，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任剑涛老师。刚才您谈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分税制之后逐渐出现的土地财政以及土地金融，导致我们现在，尤其在今年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去杠杆，进行区域地方债务。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高额的 GDP 的背后，我们极其巨大的乃至不敢想象的这种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的问题，在当下怎么去理解？谢谢。

任剑涛：实际上债务不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是消化的问题，这样从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我说的微观搞活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它在运行制度上已经开始设限了，在宏观制度上是刚性设限。因为它不可能通过产权的调整来通过刺激经济的发展，实现宏观、微观和中观制度的协调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属于财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和中央合谋的一个财政性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安排问题。



2018 年 11 月 5-8 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现场

那么以至于怎么样去化解目前如此高的这个财政风险，有人出馊主意就说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 50%，债务可以化解 60%。但是这个风险非常巨大，因为意味着金融秩序的一种隐形崩溃，那将是证券不能承受之重。那么好的做法是什么呢？估计目前起码从专家角度来讲，我其实是行外汉，我学政治学。那么在我看来，化解这种风险当然其实就是重启政治制度改革。那么地方的不是隐形债务风险而是显性债务风险，由地方和中央怎么样去共担，或者由中央和地方按多少费用去承担这个债务化解责任，这是一个可安排的问题。但实际上目前不太可能，实际的做法是什么？目前政策思路不清晰。那么在学术思路上来说，经济学家金融学界有他们的看法。那么在我看可能地方的自治重启这个地方市场的竞争性机制可能是出路之一。但问题在于杠杆过高的情况下，可能我们都要对风险的后事要做好准备。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秩序的可能性封闭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共同挑战，也许是中国未来 3 到 5 年面临最大的一个改革难题。

提问：所以在接下来这个资产价格可能在中国会有下降？

任剑涛：对。但是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我们也就不去明确表达了。

提问（英文）：今天的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

贺卫方：这种问题很容易回答。我想从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的结构来说的话，这个社会 2000 年来确实是一个特别不承认，特别的倾向阶级化的构造的社会。一直以来比方说从 1000 年前的科举考试，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加平民主义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皇帝和分散的各原子化的百姓。我自己觉得从来没有说像法国或者说其它的地方，用一种从血缘的贵族来去选任官员这样一种体制。所以到现在我们中国我想很难能够形成一种真正的阶级社会，Mao zedong 当年说中国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胡说八道。他不尊重中国的历史一个说法，他人为想去制造一个新的理念，把任何他自己感觉到反抗他的人都说是阶级敌人。所以它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政治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判断性的问题，我想是这样一个回应。至于说现在是不是还有某种这个说法，现在主要是对外国人来说的，比方说有“海外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不是外国的，所以我不知道哈佛是不是也属于这个。

提问：假如中国经济继续走向自由化，同时政治继续走向集权化，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贺卫方：都是你们的问题，有危险就往外推。

荣剑：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答案，刚才萧功秦先生也说有两个方案。我不讲他的方案，就讲我的观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面临着巨大问题，原有的统治格局，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推动整个经济的自由化，持续了 20 年的时间，创造了巨大增长的绩效。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着绩效不断衰减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尖锐。从 Dang 国的治理系统来说，它仍然是希望在加强政治控制的条件下来推进经济自由化。今年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困扰？民营企业家的预期为什么会严重恶化？这是改革 40 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大家应该都知道，王健林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是多么得自信满满，马云先生在去年还表态要用 20 年的时间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今年发生什么了？他退休了，他为什么要退休？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一个宏大的目标？就是因为他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ZG 最高领导人在最近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民营企业进行安慰，他重申了两个不可动摇，一个是发展国有企业不动摇，另一个是发展民营企业不动摇，但这样的话已经讲了多少次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了两个文件，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好的文件，一个是坚持市场化导向的

改革，一个是坚持依法治国。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在一个民营企业的高层论坛上，民营企业家提出了三个口号，第一是保卫私有财产，第二是捍卫市场经济，第三是建设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当下的三个共识。企业家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已经开始不得不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了，原来他们说要远离政治，不讲政治，通过远离政治的方式来保持他们自主发展的权利，但现在他们的权利已经受到了政治的巨大干扰。我们可以看一看明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参会者 2 : yes, one and two and three.

提问：那我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关于法律的问题，老师可以回答一下。你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些年当中，所以你觉得就是司法或者法律，它究竟是一个标还是一个本？就是你如果在中国，比如说没有这些根本的政治改革宪政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去推动一些当然像司法考试或者是法袍，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但是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对中国是有作用。

贺卫方：我简要的回答，其实问题非常重大，也经常困扰我。我想其实从人类的司法制度构造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某些时候可能是目标，但是后来你实现更大的目标，你发现它还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类可能在不见得都很提前预想好的一个计划方案的情况下，慢慢的去建立在一种对公正的诉求追求的基础上，改进相关的制度，改进相关的制度的构造，比方说如何让法院变得越来越中立，虽然说法官是领国家的薪水的，但是实际上法院慢慢变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立裁判者。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想象一个行政诉讼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如何去改进？比方说增进律师对法律程序的一种参与和保障律师的独立性，我们如何去让取证制度变得更加合理，听上去听还好，好像挺琐碎的，挺技术化的一些举措，一些推动，实际上最后都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根本性的转型，就会发现最后司法真正能够独立了，司法真正能够公正的甚至人民对司法权力的信赖，超越了对其他的一些权力的信任。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我想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然你可以想象有时候可能当你鼓吹宪政，像秦前红教授这样的学者鼓吹宪政太危险的时候，你补充一下政治制度的改革总还是可以，发表一点东西的。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请任剑涛老师回答，我是美国一个独立智库的执行长，负责战略分析的领导。我本人是一个企业家，10年前过来，那现在我在大陆流程上挖得很深，所以这也是我稍微自由地去表达一些的原因。我想在最近的一个半月内，我介绍了百十几位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会有更大的企业家跟我过去朋友，他们给我电话的联系方式，都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特别的担忧和焦虑，同时也表达了一个资产需要做配置的材料类型的这么一个考虑。当然今天我们习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了，

我想问任剑涛老师，就是说我们的 Dang 国还要做哪些工作能够挽回目前企业家这种信心，或者说这是焦虑和忧愁，那么您觉得还能挽回吗？除了现在这条路，还有什么路可以让这个形势挽回去？

任剑涛：实际上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是荣剑教授。因为他在做企业，但是问题是对我提供的，我首先答几句，还有我们荣剑教授来做这个斧正，我觉得当地企业家信心是一个政治家点的问题，这是习总书记已经做的。我们要发展国有经济，大家一阵恐慌，要进行海外资产配置，这个时候企业就发现问题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进行政治案例，首先是座谈。在政治案例之后，跟进的就是一个政策配置，你的政策有没有对这个企业家在国内的资产安全有保证，资产安全同时发生的资产增值的可能性，不仅仅说是也爱护你，尊重我的财产权，而是我财产的增值权能够在政策上有反应。现在可以说这是第二步要做，以政治家已经做完，那么就是政治政策。第三个我相信就是处理个案，处理个案荣剑教授在微信上也有很多呼吁。比如说这个“郎顾之争”的顾雏军个案一些问题的企业家，如顾雏军个案怎么去处理？你如果把这些经典个案处理的好，企业家们真正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放心，那么财产的惊恐性转移，地下钱庄的一个运作，它就会自然稳定下来。所以这需要一个立体化的工程一步一步推进，因为最近五六年可能对私有财产的控诉，尤其对改革开放实物归咎于私人企业家的某种缺陷，它形成一个政策过程，怎样逆转政策过程，单纯的政治压力不够，但是没有政治压力，当然更增添它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还需要有时间。

问题二 贸易战要避免政治上的紧缩效应

提问：这个问题是提给几位老师的同事，是关于在反贸易战开打之后，据我观察，好像内地的知识界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思考，就是到底贸易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似乎有两派意见，一方面可能意味着贸易战会使中国的外交更加务实，更加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法治、降低关税，甚至会想到或者会推进进一步的政治变化。因为今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至于所谓就是顺水推舟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意见，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更加对立的一个状态，然后的碰撞会让这个体制变得更加不安，甚至会让他专制的这个成分以及他的行为比较突出，是想听一下几位老师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最近也都在思考的，就是想听听几位老师怎么想？

.....

萧功秦：我觉得它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促进中国的在对外贸易过程当中，改变原来所形成的一些被外国人视为“重商主义”的一些办法。实际我们目前看来，在财政部的一些网站上面，在不声不响的做一些非常重大的改革，引起了国内左派的不安，包括一些准入制度的改革，这和贸易战方面外部对我们的压力应该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起了一个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贸易战过程当中，

中国有可能也会不自觉地激活在传统革命时代所产生的“紧缩防御效应”，或“紧缩防御机制”，外部的压力越大，我们会习惯成自然地作出收缩反应，通过像刺猬一样的紧缩，来产生一种防御，这种机制有可能会进一步地把原来左的一些因素动员起来，激活起来。

这两种可能存在。对于贸易战的前景，我们不能悲观。当我们很悲观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理性一时无法了解一些积极的因素正在起作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往往只能根据理性注意到的不利因素来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积极努力，沉着应对，就会使中国的经济在接受世界一体化的同时，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拿国际与周边关系来说，朝鲜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菲关系问题，它们曾经是我们觉得是麻烦的问题，但是近一二年来，这些关系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有的好得出乎意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我们警惕不要回到紧缩防御反应上去，积极回应，不断用改革的精神处理中外贸易关系，就会使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

提问：我是一个普通的数学老师，我今天听了四个老师报告，我原来在北大听过贺老师的科，我原来是清华的。今天听了四个老师报告以后，我觉得我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我感觉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现在跟任老师讲的政治学，我觉得我学了很多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觉得很舒服，感觉人人讲过读书，因为我是个数学老师，我喜欢真理，喜欢就追求的。萧功秦老师讲的，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胃口，从历史的角度上讲。我原来在北大也听过贺老师演讲。我感觉贺老师是从权力的角度说共产党长治权，跟这个法律的权中间有斗争有博弈，但是这个法律权总处于一种弱势，所以很反感它。荣老师讲的这个资本，因为还是共产党领导，他说的这个权力本身就是斗争，在美国也一样。但是我想问问，我在听这个争论过程当中，感觉你们在嬉笑怒骂我们这个国家，我感觉很多事，有很多人我感觉为什么会吵到我们这个国家？我想问问贺老师荣老师和萧老师。

贺卫方：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的批评。国家是不是可以批评？批评是不是就是嘲弄？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我相信你跟我一样的，都是经常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中。其实不完全是在嘲弄，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会点调侃的语言，只不过就是说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想去自己舒缓一下，显得自己很轻松，但是绝无意去嘲弄，其实现在谁敢嘲弄它。我经常说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们太伟大了，你们太厉害了，你们太无孔不入了，你们说封掉，我现在一点发言的空间都没有，你相信我，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是特别尊重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么强大的一个就存在，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并不在赞美政策，永远需要区别什么是叫国家？因为国家分明，所以说中文世界里面国家特别的不像英文，nation 我们非常热爱，country 我们也很热爱，state 我们就要防范，我们就要特别的防火、防盗、防政府。

荣剑：我这里补充讲一下 50 人论坛，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在 50 人论坛上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发声

这个事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论坛上讨论的主题，有人评论说就是吃屎好还是吃饭好，明白了吧？当然这是一个调侃。实际上经济学家们讨论的问题的确都是一些常识性问题。像刚才贺老师讲的，都是常识性问题。但就是这些常识性问题，在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地去讲，包括像贺老师这么大的知识分子去讲一些常识性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在中国讲常识都非常困难。谢谢大家。 🍷

[【返回目录】](#)

盛洪：社保不是税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9 年 2 月 13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本文作者**盛洪**教授

据说将收缴社保资金的职责由人保部门转交给税务部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一个会议“部署”的。雷厉风行，8 月 28 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裁定强制追缴某公司过去 10 年的社保资金 200 余万。这引起普遍恐慌。后来又据说这一措施要在 2019 年全面实行，更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又对企业加上重重的一击。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老板们不愿意再扛下去了？”的文章中引述一个老板的话说，“下个月就要实行的社保改税，人事成本直接会上升百分之三十左右。”大概是负面反应太多了，后来听说国务院勒了一下手刹，“暂停”社保转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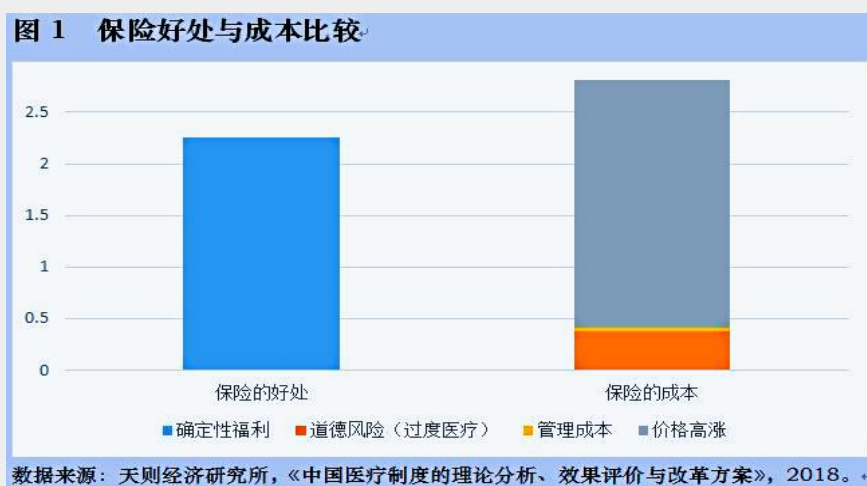
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社会保险制度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但不是这个方向。保险制度的基本目标，就是减少不确定性，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偏好。他们宁愿要捏在手里的 100 元，也不要掷硬币得到的 200 元。但保险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如道德风险（骗保或故意疏忽），逆向选择（健康的人不买），管理成本等。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带来价格上涨，这里主要指的是医药价格。我们 2017 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国医疗制度的理论分析、效果评价与改革方案》发现，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在保险体系下的消费者自付率与医药价格存在着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自付率越低（保险赔付率越高），引起的医药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在极端情形下，如在独家垄断的情形下，价格上涨的倍数约等于

自付率的倒数。即如果自付率是 10%，则价格则为原来的 10 倍。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购买了保险以后，会把已支付的费用看作沉没成本，他们在就医时真正考虑的成本是当时的边际成本。这除了看病时间等成本外，就是医药费用的自付部分。如果自付率是 25%，100 元的医药费用就只支付 25 元，这对他来讲，就相当于医药价格下降了，他可以多买。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一般认为更贵的药效果会好很多，并且如果他买更贵的药，保险报销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 200 元他将报销 150 元。由于存在着“保险幻觉”，他会认为他赚了 150 元，比买 100 元的药报销 75 元更多，他就更有可能购买更贵的药。我们为此研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 17.8% 的人有为医药费达到保险起付线而凑单的倾向，有 11% 的人有为家人亲戚多开药的倾向，有 71.5% 的人认为医生有诱导过度医疗的行为。

如果这种因参加保险而产生的计算变化乃至行为变化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则众多投保人的此类行为就会将医药价格水平抬高。这种保险制度的弊端到了中国就更为严重。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还不是典型的商业性保险体系，它具有垄断性和半强制性。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保体系是没有竞争者的，所以是不能从市场竞争中发现合理价格，而会给出一个垄断价格，并且还带有行政的半强制性。所谓“半强制性”，就不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就更加加强了垄断价格的偏离程度和负面作用。结果是，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 42% 的人认为即使在自付的范围内，医药价格至少是“偏贵”。

我们对此构造了一个经济学数学模型，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数据，我们估计中国医疗社保推动中国的医药价格水平上涨了 73%，使消费者多购买了 21% 的医疗服务或药品，即所谓“过度医疗”。综合起来，使医药费用增加了 110%。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医药费用的相对价格，即人均医药费用占人均 GDP 的比重迅速提高，从 2008 年的占人均 GDP 的 4.03% 上涨为 2015 年的 5.22%。最重要的是，医疗社保带来的成本甚至高于它所带来的“确定性”好处。在不少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估计这个“确定性”好处大约等于人均 GDP 的 2.25%。按照 2014 年的数据，中国现有的医疗社保制度带来了约 2640 亿元净损失。见下图。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医疗社保制度没有解决保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大病重病的医疗费用报销的问题；却带来了不少“小问题”，它更多地是解决小病（门诊）的医疗费用问题，而这本是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一般都能承担，而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报销游戏，在这个人人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游戏里，他们实际上吃了亏。当真正需要保险起作用的时候，即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时，医疗社保却用支付上限（一般最多 30 万元）回避掉了。而现在的商业保险，如平安保险，每年支付 460.5 元，可保大病最高报销 50 万元；泰康保险，一个无社保的 36~40 岁的人支付 1224 元/年，就可以在大病时报销至多 600 万元。要知道，在现有社保体系下，按照 9.5% 的扣款率，一个月收入 5000 元的职工一年要交 5700 元的医疗社保。

在医药费用严重偏高的基础上，保险费用还显著偏高。因为如前所述，社保不仅垄断，而且半强制。综合各类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老，医疗等，我们也能发现社保价格明显偏高。关于强制性垄断高价的证据，就是社保基金一直保持着巨大余额，到 2017 年已达 77312 亿元，从 2008 年到 2017 年，平均余额占社保基金收入的比重高达 18.3%。这意味着即使在低效使用社保基金的情况下，考虑管理费用约为 2% 的情况下，这种半强制性的社保定价还高出成本 16 个百分点。而这个巨大结余部分，可以用于低风险投资，增值部分可以返回基金用于保险支出。但我们现在在网上查不到相关数据，因而在公众监督的视野之外。

社保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尤其是医疗社保，更应利用市场机制抑制住医药价格的上涨和过度医疗，把中国医药的相对价格水平（人均医药费用/人均 GDP）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既然保险体系下的自付率与医药价格成反比关系，既然小病（门诊）保险并不是保险制度的目的，我们的改革思路就是，要去除小病保险，把重点放在大病保险上，并将自付率提高。我们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取消小病（门诊）医药的保险安排，而将大病（住院）保险的自付率提高到 70%；如果人的大病费用高出当年收入的 40%，则可由国家设立的大病重病救助基金报销，据我们模型的估计，这个基金的规模 2000 亿即可。有人可能会对这一方案提出反驳，因为这似乎大幅度减少了人们的福利。其实不然。因为现有的医疗社保是有成本的，企业和个人要在扣除相当于工资 9.5% 的资金，而我们的改革方案中，只需扣除 3%。总体而言，改革将会带来 46.7% 的医药费用的节约。

在解决医药价格问题的基础上，还要解决保险市场价格虚高的问题。这就是要将半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转变为自愿性的商业保险，同时促进商业保险公司间的竞争。社保半强制性地将所有的人纳入到社保体系中，人们就没有“不买社保”的选择权利，就不可能在“买保险”和“不买保险”之间进行成本收益权衡。从宏观角度看，“无保险”就是这个垄断的“社保”的竞争者，不买保险的人实际上在边上产生巨大的压力，使得垄断的社保不至于将价格抬得太高。例如美国无保险人口比率约为 15%（2008 年），英国即使实行了全民医疗体系，私营医疗机构仍占 15% 的市场。无保险人口的存在不仅对保险价格产生压力，而且促成医药市场的真实价格体系，这又为保险公司制定医药成本提供了市场

信息参照。奥巴马医改本意是要实行医保全覆盖，但没有多少年就弊端丛生，其中包括本文所指出的弊端，最后又被废除。

回头看一下“社保转税”。与社保相比，税就是完全强制性的，如果不交社保，只是违反了行政规定；如果不交税，则触犯了刑律。因此“社保转税”不是一个技术性变化，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问题。为什么是权利问题呢？因为社保只具有半强制性，仍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要求。许多企业不交社保，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对它们有利；而它们不交社保又是应工人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很大，当遇到经济不景气，他们就会裁员；而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一旦被裁，就到别处去找工作，或回家乡；而社保却带不走。所以他们宁肯要现金而不要社保。企业和工人的这点选择空间，其实有利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幸亏社保没有那么大的强制性，所以才能让企业和工人有这样的选择自由。所以，社保转交税务，就是对公民和企业权利的削减。

更何况，过去多年的现实是，交纳社保的企业和工人也没有按社保要求的比例去交。大多数企业只以基本工资为基数交社保，此基数低于全部收入。按照宋晓梧的估计，2015年实交社会养老保险基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55.7%。反过来说，一旦要求按照社会养老保险要求的比例像纳税那样扣交社保资金，企业和工人要多交55.7%。这显然是骤增了一笔成本，几乎没有企业能够承受。如果交社保还要强制的话，企业没有任何通融余地，很多企业就只好关门大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在实交率较低的情况下，如前所述，社保价格已经明显虚高16.3%，并在多年中积累了7万多亿元的余额，这说明社保规定的社保扣交比率偏高，本应向下调整，但“社保转税”的作法竟不仅要虚高的社保价格用法律固定下来，还要提高55.7%的水平，并消灭一切不交社保的企业，这真是南辕北辙，逆真正改革的方向而动。

孟子曾将最佳税率（十税一）称为“尧舜之道”，高于此者被称为“大桀小桀”，即为“暴政”之意。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说，“不要只考虑税收。”因而古今文明国家对加税（税种，税率）持极为严格和谨慎的态度。中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经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如果用收税的形式征收社保资金，不管表面上是否仍叫“社保”，实际上是增加了一种“税”，因为由国家“强制性征收”的就是税。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只是行政部门，没有立法权，所以他们的“决定”也没有法律效力。况且《立法法》第八十条又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这几个行政部门通过内部工作会议的“部署”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却做出了减损公民权利的“决定”，显然是对立法权的僭越和对法律正当程序的蔑视。

最后，这几个行政部门的“部署”似乎也没有在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和四中全会确定的“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原则，而是通过“社保转

税”让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以及用部门“部署”的方式违反《立法法》这个宪法性法律和法律正当程序。这是令人震惊的。这也说明，上述两原则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很难。我们还能经常发现大量的行政部门通过“意见”或“规定”不断地蚕食《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首先需要行政部门要有宪治意识，时刻警惕自己不能越《宪法》和《立法法》雷池半步。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法律界及时指出这种僭越立法权的行为，提醒社会和行政部门，及时纠正这样的错误。根据《立法法》和上述中共两原则，所谓“社保转税”，不是“暂停”就可以了。它本不该“开始”。 罍

[【返回目录】](#)

张曙光 张弛：经济增长逐季下行 实现稳定相当艰巨|2018 年第 4 季度及全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本文首发于 2019-2-17 中评周刊]



本文作者张曙光教授

内容提要：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 6.6%，完成了年初设定 6.5% 的增长目标，却呈逐季回落态势。除贸易受抢出口的拉动增长异常以外，投资和消费都有所趋缓。就业数据不错，但实际情况堪忧，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是一个正确选择。减税降费是稳就业和稳增长的良方，需要改变现行零敲碎打的施策方式，抓住增值税和社保缴费等主要税（费）种，大力度减免，方能奏效。实行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更要关注化解金融经济风险。2019 年能实现 6% 的增长就是最大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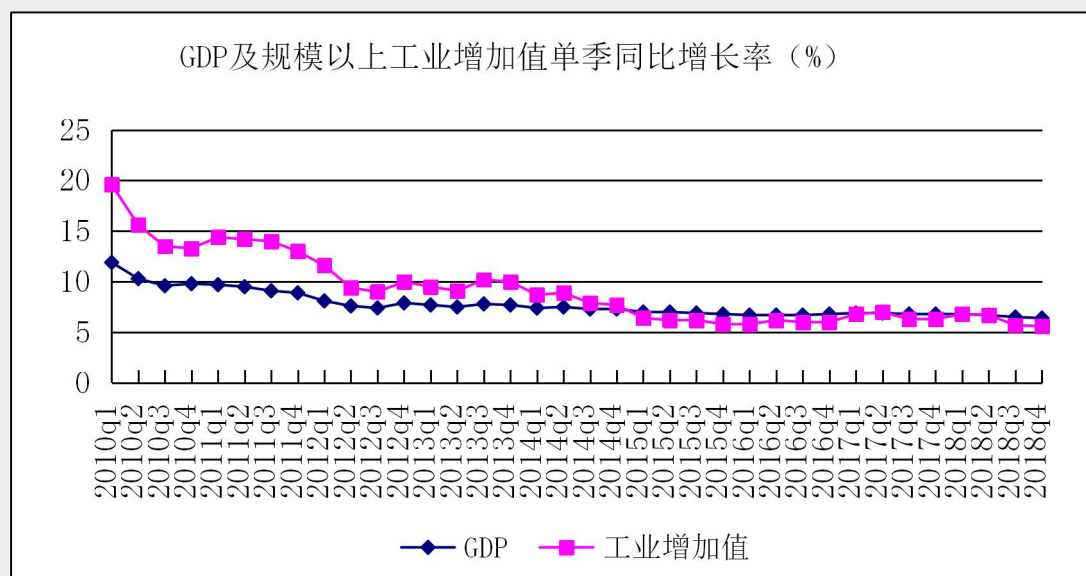
一、总量态势

1. 经济增长逐季回落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90030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三季度增长 6.5%，四季度增长 6.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47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366001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469575 亿元，增长 7.6%。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 6.2%，增速缓中趋稳。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6.2%，集体企业下降 1.2%，股份制企业增长 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4.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2.3%，制造业增长 6.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9.9%。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1.7%、8.9%和 8.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5.5、2.7 和 1.9 个百分点。

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 7.7%，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37.0%、10.1%。



2. 居民消费价格稳定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1%，处于温和上涨区间，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城市上涨 2.1%，农村上涨 2.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9%，衣着上涨 1.2%，居住上涨 2.4%，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1.6%，交通和通信上涨 1.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2.2%，医疗保健上涨 4.3%，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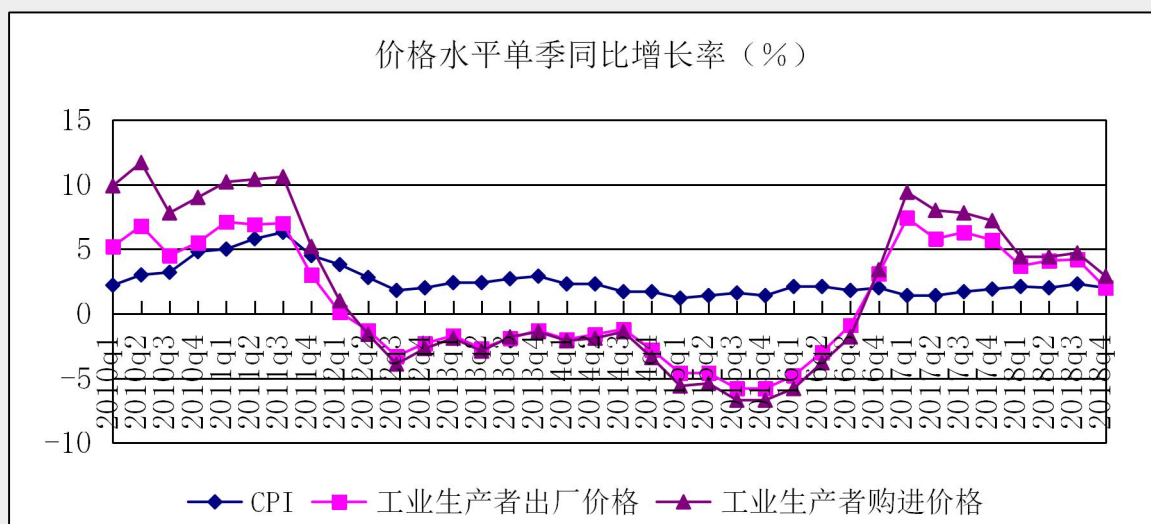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 3.5%，涨幅比上年回落 2.8 个百分点。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上涨 4.1%。

3. 城镇新增就业超计划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61 万人，比上年多增 10 万人。2018 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4.8%-5.1%之间。12 月份，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7%，比上年同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主要就业人员群体 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4%，与上月持平。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586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3419 万人。全年农民工总量 2883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84 万人，增长 0.6%。

4. 外汇储备和汇率相对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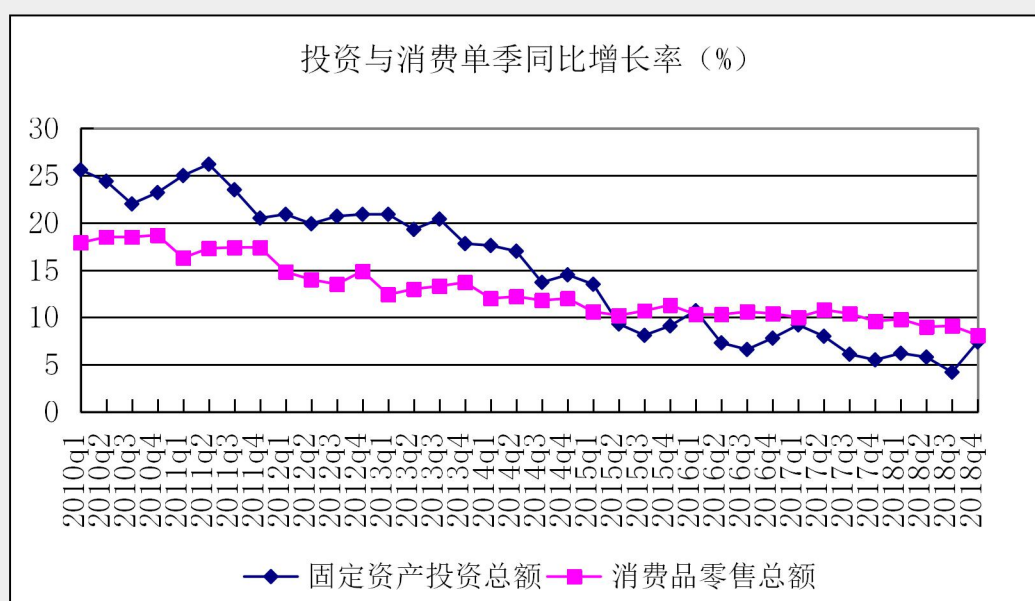
12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07 万亿美元。比 9 月末少 200 亿美元。12 月末，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兑 6.8632 元人民币，比 9 月末升值 1.6 个基点。



二、因素与结构

1. 民间投资增速稳定 居民消费增长趋缓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2.9%，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2%，加快3.0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加快4.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增长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6.1%和11.1%，分别比制造业投资快6.6和1.6个百分点。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0264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增长1.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2.2%。全国商品房销售额149973亿元，增长12.2%，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4.7%。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45311亿元，增长5.7%。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5637亿元，增

长 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5350 亿元，增长 10.1%。

2. 贸易顺差继续收窄 实际使用外资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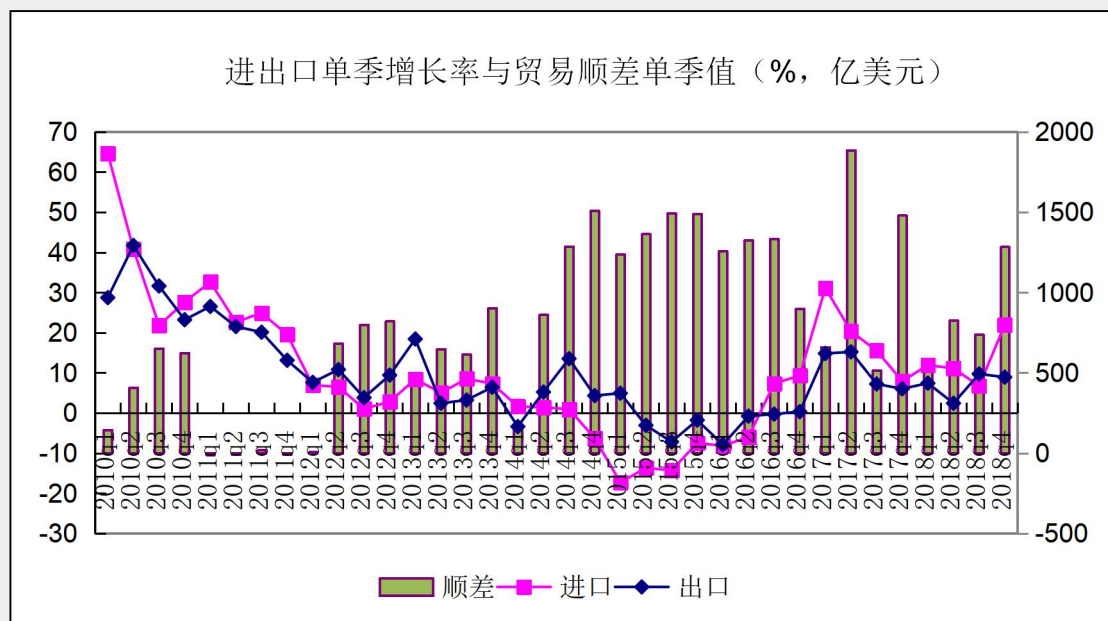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3050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其中，出口 164177 亿元，增长 7.1%；进口 140874 亿元，增长 12.9%。进出口相抵，顺差为 23303 亿元，比上年收窄 18.3%。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面增长，对欧盟、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7.9%、5.7%和 11.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势良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增长 13.3%，高出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 3.6 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239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

1-12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0533 家，同比增长 69.8%；实际使用外资 8856.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9%。

2018 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29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其中，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 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2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0.3%。

3. 财政收入增速略降 政府基金收支大增

1-12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352 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447 亿元，同比增长 5.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97905 亿元，同比增长 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56401 亿元，同比增长 8.3%；非税收入 26951 亿元，同比下降 4.7%。



1-12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0906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2708 亿元，同比增长 8.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8198 亿元，同比增长 8.7%。

1-12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5405 亿元，同比增长 22.6%。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033 亿元，同比增长 4.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71372 亿元，同比增长 23.8%，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5096 亿元，同比增长 25%。

1-12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0562 亿元，同比增长 32.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3089 亿元，同比增长 13.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7473 亿元，同比增长 32.9%，其中土地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69941 亿元，同比增长 34.2%。

4. 狭义货币增速锐减 贷款增速加快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82.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比上年同期低 10.3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7.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全年净投放现金 2563 亿元。

12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41.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同比加快 0.8 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6.17 万亿元，同比多增 2.64 万亿元。全年外币贷款减少 431 亿美元，同比多减 953 亿美元。

12 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82.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3.4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71 亿元。全年外币存款减少 634 亿美元，同比多减 1413 亿美元。

5. 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 加权平均利率波动不大

2018 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012.71 万亿元，日均成交 4.02 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增长 26.4%。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75.7%，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46%，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0%。

12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57%，比上月末高 0.08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34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68%，比上月末高 0.2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43 个百分点。

6. 中国股市全球垫底 A 股投资者人均亏损近 10 万

在中美贸易冲突、美联储加息、地区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2018 年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多国股市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差成绩，A 股在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垫底。

2018 年，上证综指收于 2493.90 点，全年跌幅达 24.6%，深成指跌幅 34%，二者均为历史第二大跌幅，仅次于 2008 年；创业板全年跌幅近 29%。A 股全年市值蒸发近 2.4 万亿美元。以 2018 年 A 股期末投资者数量 1.45 亿计算，投资者人均亏损 9.9 万元。

2018 年全球主要股指普遍下跌，全球股市市值减值近 12 万亿美元，创历史第二大记录。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 5.6%，纳指终结六年连涨，标普和道指三年以来首次年度下跌；日本日经 225 指数全年跌幅近 13%，韩国首尔综指数全年累计下跌 17.3%，香港恒生指数全年下挫 14%，MSCI 除日本外的亚太股指全年跌幅为 16%；MSCI 新兴市场股市全年下跌近 17%；欧洲 STOXX 600 指数全年累计下跌约 13%。



三、政策效应

1. GDP 走势及其核算

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9003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6%，完成了年初政府设定 6.5% 的增长目标。按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约 13.6 万亿美元，按年末大陆人口 139538 万人计算，人均 GDP 达 9746 美元，接近 1 万美元。在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相当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实绩，确属不易。

2019 年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7 年 GDP 最终核实数据，为现价 820754 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少了 636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2016 年增长 6.8%，比初步核算数调降 0.1 个百分点。2018 年的 GDP 增长率是按照调整后的数据计算的。根据中信宏观研究，2018 年全年的 GDP 平减指数大约是 3.7%，要达到 6.5% 的增长速度，全年 GDP 的名义增长率应为 10.2%，名义值应为 904470.9 亿元。而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分别是 9.69% ($=900309/820754-1$) % 和 900309 亿元。这里的差别出在了平减指数上。

应当指出，统计局的 GDP 核算分为两步，第一步当年进行初步核算，第二步次年再进行核实。这是统计工作的规定程序，核增核减都有可能，本无可厚非。统计局未公布平减指数。按照其公布的数据计算，2018 年全年的平减指数是 3.09% ($=900309/820754-1.066$) % (严格地说是 103.9%)。按此计算，如果 2017 年 GDP 不核减 6367 亿元，今年的 GDP 增长率只有 5.76% ($900309/827121-1.039$) %。

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 年 4 个季度 GDP 的增长率分别是 6.8%、6.7%、6.5% 和 6.4%。很明显，呈逐季回落态势，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讨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结论有点言过其实，还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套路。可喜的是，制造业增速加快，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速度都在 8% 以上。

统计局没有公布 2017 年分季度的核实数据，如果用当年第 4 季度的初步核算数据 (233834 亿元) 计算，那么，2018 年第 4 季度 GDP 的增长率只有 3.57% ($=249410.2/233834-1.0309$) %。即使

把 2017 年核减的 6367 亿元按 4 个季度平分（每季 1591.75 亿元），2018 年第 4 季度的 GDP 增长率也只有 4.3% $(249410.2/232242.25-1.0309)$ %。如果按全年的平减指数计算，第 4 季度要达到 6.4% 的增长率，那么，2017 年第 4 季度的 GDP 现值核实数应为 227792.7 亿元 $[249410.2/(1.066+1.0309)]$ ，也就是说，2017 年第 4 季度 GDP 应当核减 6041.3 亿元，占当年核减数的 94.9%，只比全年核减数少 325.7 亿元。我们认为，事实并不如此，统计核算也不会做成这个样子。至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看了上述计算，读者会有自己的答案。可见，数据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明了，而是相当奥妙，有很大学问，值得认真探索和辨析。因此，进行 GDP 核算和调整，应当注意数据之间的关系，否则，出现漏洞和矛盾，必将招致诟病和质疑。

2. 三大需求因素分析

从消费来看，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比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比前 3 个季度回落 0.3 个百分点，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76.2%）在提高。消费品零售额下滑的重要原因是，汽车类相关消费出现负增长，家电类消费低迷。2018 年全年汽车销售 2808 万辆，同比下降 2.8%。拐点出现在下半年，自 2001 年开始，国内汽车产销量一路上涨，政策刺激的年份（如 2008、2012、2015）增速有明显提升，但刺激效果递减。在过去保有量不高的情况下，受购置税等政策的影响较大，2017 年 1.6L 排量以下的车还能享受 7.5% 的购置税，2018 年 1 月 1 日就提高到 10%，下滑最大的是低价位的车型，6 万元以下的微型车下滑 35 万辆，6-8 万元的车型下滑 77 万辆，而 12 万元以上的市场区间全部是增长的，其中，25 万元以上的“豪车”增长了 11.3%。有人不无讽刺地说，简直是“一副不合时适的消费升级景象”。2018 年是中国家电市场的分水岭，在 2017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市场严冬正在来临。据中怡康统计，1-10 月，彩电市场零售 3692 万台，同比下降 2.3%，零售额 1137 亿元，下降 11.1%。白电器除空调外，其他品类几乎没有增长，前几年一直高速增长厨电，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家电行业是一个周期性发展行业，受房地产的发展影响较大，房子限购导致新增需求减少，经济下行导致消费减少，家电新品心意购买动力不足，以及刺激政策的缺席。正因为如此，发改委正准备在 2019 年重启前些年实施的汽车、家电销售的补贴政策。不过，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信息，据报载，工信部提出，要减少和限制老年人低速代步车的生产，难道让老年人都去开快车？

消费是经济增长中最稳定的因素，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2018 年的消费中也有一些新的亮点。服务消费持续提升，信息消费成为一大特色。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信息消费规模 5 万亿元，增长 11%，信息服务消费首次超过信息产品消费。出现了实物消费个性化、服务消费智能化、文旅消费精品化的特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语）据移动数据与分析提供商安亿致用公司发布的《2019 移动终端状况》报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之一，2018 年，全球消费者花在 App 上的 1010 亿美元中，中国贡献了将近 4 成，包括付费下载、应用内购买和应用内

订阅等。在全球顶尖的 300 家技术企业获利的消费者支出中，中国企业获利了 32%，大约 196 亿美元的收入，腾讯是五家获利消费者支出最多的公司之一。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2018 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8.7%，实际增长 6.5%，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不过，随着经济走低，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测 2019 年消费增长 8.7% 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仍将超过 75%。据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研究公司估计，2019 年中国的零售额将增长 7.5%，达到 5.636 万亿元，占全球网上销售额的 55.8%，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销售市场。

从投资来看，2018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9%，比前 3 个季度加快 0.5 个百分点，且 4 季度逐月回升。对稳定当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效果。为此，发改委全年共批准投资项目 189 个，其中 4 季度批准 42 项，包括“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厦渝通道的组成部分重庆至黔江、包头至银川铁路的银川至惠农段、上海经苏州至湖州段，以及青海-河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从 12 月 5 日以来的 1 个月，发改委共批复 8 个城市和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项目，包括重庆、济南、杭州、上海、长春的城市轨道交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西安至延安、江苏省沿江城市群三个区域铁路建设。这将对拉动 2019 年的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各地多在 5 月前后调整预算，导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速度偏慢，特别是鉴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再加上 2019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有可能呈现下行态势，报纸上普遍认为“基建将是 2019 年稳增长最值得期待的方式”，“基建投资将被当作稳投资、稳增长的着力点”。人大常委会正式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2019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1.39 万亿元。从 1 月 22 日起，河南、福建、天津、云南、四川、浙江等省市开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 月发行总规模预计超过 2400 亿元。地方债供给放量为基建提供资金来源，使基建增速回升，有望支撑 2019 年的经济增长。1 月 2 日，中国铁总工作会议指出，2019 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强度规模，确保投产新线 6800 公里，比 2018 年预计 4000 公里、完成 4683 公里增长七成。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推进京津冀暨雄安新区交通建设”，雄安新区周边的京雄城际铁路、京石高速等项目建设将加快推进，京港（台）高铁京雄段和雄商段、荣乌高速新线、京雄高速公路将加快前期工作。其中，京雄城际铁投资 335.3 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整个雄安新区的投资可望突破千亿元，未来投资总量或达到万亿元级别。

大规模的政府基建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 2019 年投资和增长的稳定作用无可怀疑，但有两个负面作用无人提及。一是政府发债实施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明显，一方面通过发行债券把民间的资金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鼓励民间投资，减少的民间资金从何而来？如果说减税增加了民间的资金，那么，发债又把资金拿走了。我们这里只是指出问题所在，至于挤出效应究竟有多大，这是需要具体计算才能说明的。二是基建投资的效率问题，发改委一再表示，“不搞大水漫灌”，“要精准补短板”，这很好。的确还有一些短板需要补。但总体来看，基础设施已经超前，如果说以前的投资效率不错，

那么，随着情况的变化，投资效率逐渐下降。据说，有的高铁站建成多年尚未使用，有些高铁、高速人流、车流不多，在那里晒太阳。我们不知道这些投资何时能够收回？何时能够盈利？事实上，发改委管得了投资，却管不了盈利，管不了效率。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要追求增长速度，但它仍然是背后的指挥棒，推着政府不得不这样做。这不仅不能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向着提质增效的方向发展，而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

2018 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人预料，全年超过 30 万亿元。按美元计，出口增长 9.9%（按人民币增长 7.1%），进口增长 15.8%（按人民币增长 12.9%），贸易顺差 3517.6 亿美元（按人民币为 2.33 万亿元）。特别是对美贸易，出口 4784 亿美元，进口 1551 亿美元，顺差 3233 亿美元，相当于全部贸易顺差的 91.9%，为 2006 年以来最高。似乎中美贸易战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反而促进了中国的贸易。这似乎也无人相信。当然，这样的数据不值得庆幸和乐观，事实上，12 月的情况已经转向，按美元计，出口下降 4.4%，进口下降 7.6%，分别创 2016 年 12 月和 7 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这证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趋缓已很明显，抢出口的因素已经消失。我们在第 3 季度的报告中就根据一些出口商的反应，指出了抢出口的问题，事实上，据有关人士透露，美国西海岸加州一带的仓库已经堆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准备交付 2019 年的订单。这样一来，2019 年第 1 季度的外贸形势不容乐观，也许是全年最糟糕的一个季度。不仅如此，进口下降虽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因素，也进一步表明国内需求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不知是福是祸，的确令人哭笑不得。

3. 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 年的就业形势很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361 万人，连续 6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保持在 5% 左右，实现了低于 5.5% 的预期目标。实际上，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早在 2018 年 11 月 2 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就业问题。12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就业压力仍然较大，要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服务，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形势持续稳定。重点举措包括，对不裁员或少的参保企业，可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力度。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和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扩展至 16-24 岁失业青年。对下岗失业人员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及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对符合条件的及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救助范围。为了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扩大就业，会议决定，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

和从 3%阶段性降至 1%的现行政策，明年 4 月到期后继续实施。应当肯定，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和及时的，也是可操作的。广东省和深圳市还制定了稳定就业的详细补贴计划。

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一起构成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我们一向很少讨论，因为没有数据支持，现在的讨论只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也无具体数据。问题在于为什么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和政策如此背离，看来，我们的就业和失业统计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只发布每年新增就业数据，并未减去每年失业的人数，所以就业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无法知道。按照 2018《中国统计年鉴》的解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 周岁至退休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很明显，它的统计范围是非农业户口，显然不包括进城务工的 2.88 亿农民工和城郊非农业户口。计算的分母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加上其他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而不是城镇中劳动年龄人口。这样的统计除了说明我们现行政策的城市偏好以外，对研究失业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根据我们的观察，当前就业问题其所以严峻，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和情况。

一是 2018 年的环境风暴使不少中小企业关门倒闭，一批工人失业。

二是中美贸易战使中国内外环境恶化，再加上营商成本加大，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外迁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也使一大批工人下岗失业。

三是国内实际制度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使一些民营企业无法经营，不是关门歇业，就是外迁他国，也造成一批工人失业。

四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多如牛毛检查、达标等，也使一部分企业无法经营。

总之，破产关门、迁出企业的下岗工人不在少数，我们没有任何调查统计。这才是失业问题的关键。所以要解决稳就业的问题，需将此摆在我们政策关注的中心。

4. 关于减税政策及其效果

减税是近几年宏观政策中高频出现的词汇，也是政府稳定经济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在内外环境不稳定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12 月 27-28 日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传出积极信号，2019 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部长刘昆说，2019 年，我国将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行普惠性税收减免，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还要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加强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健全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1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

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预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 亿元。紧接着，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的通知》和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规定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开始了新一年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

2017 年，政府实行营改增，据说减税 6000 亿元，但不少企业反应税负不减反增。2018 年政府推出了更大的减税措施，全年预计减税降费超过 1.3 万亿元。但是，正如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所说，“企业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减税感”。他分析了四个原因，一是受征管强化、传导机制不畅等原因，削弱了减税的效果；二是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利润下降，降低了企业的获得感；三是减税效应的迟滞性；四是零敲碎打式的减税方式，一方面减税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甚至导致“出力不讨好”的状况。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不过，还有一些更根本的原因，比如，政府和纳税人的平等交易关系并未建立，税收征管人员的强势地位，使得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只能听其摆布，即使强征多征，哪个企业敢于告发？再如，预征预缴，多征不退，据许善达估计多达上万亿元，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的负债，再加征税任务和指标，重复征税，征过头税现象时有发生。还如，零敲碎打、规定繁琐，征税人和纳税人都搞不清楚，实际执行相当困难等。所以，不仅要出台减税降费措施，而且要重视减税降费效果。不然，好政策也会失去人心。

还有，这次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减免税是一个进步，但只是对小微企业，不能算是真正的普惠。其实，笔者不大赞成结构性减税，它违背税收公平的原则，也难以检查其实施效果，而且还把减税变成了政府对纳税人的恩惠，扭曲了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几年减税效果不彰就是证明。与其一年国务院十次八次研究出台有关减税降费政策，不如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精简合并种税税目，抓住主要税费实行减税降费，比如，增值税能否从现在的三档减为两档，税率各调降 2-3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大幅降低；社保经交费率能否不超过 10%。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精兵减政是前提。现在，这么庞大的行政机构，这么多的行政人员，现行机构不用，成立那么多领导小组，每个小组都要搞一个办公室，机构和人员不减反增，甚至还要增加一个收费的名目，怎么能减税降费呢？

四、体制分析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国内外召开了不少纪念会和讨论会，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确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而且观点也不一致，甚至相反。即使官方的正统立场，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本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为其大造舆论，也参与过一些实践，借此，我们也想谈谈自己

的看法，而且按国人的传统，凑了十条，不管好坏对错也是一家之言，供有兴趣的善思者参考。

首先，改革开放不是在形势好的时候发生的，而是日子混不下去时候的选择，而且失败得越惨，改革有可能越彻底。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共产党在大陆建政治理 30 年，老百姓还填不饱肚子，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发生动摇。因此，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计划经济的老路，走向市场经济的新途。但共产党并未失败，还保持着对大陆的统治，因此，不可能根本改变以前的制度结构。

其次，改革开放的成败取决于对过去所犯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改革的主要成果，一是批判和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因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二是认识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是政府管得过多，控制太死，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放松管制，放弃和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因而激活了民间的积极性，但到了后期又加强管制，不仅企图垄断全部公共事务，甚至以新的方式把手伸进私人领域，扼杀了民间的活力。至于对过去的主要错误，如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对资改造、反右派、反右倾等，并未真正认识和深刻检讨，相反，1981 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认为，建国 32 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甚至对文革的认识也从深重的“灾难”变成了可贵的“探索”。这既决定了我们改革开放能走多远，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局面。可见，认错的程度制约着纠错的能力和水平，反思的深度决定了改革成败的程度。

第三，对外开放是中国重大的战略调整，在改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种战略调整是从过去的“一边倒”（向苏联）改变为向发达国家开放，这是中国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经验。中美贸易争端和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态度的改变，恐怕与我们开放方向的动摇有关。这就恶化了我们的国际环境。不仅如此，对外开放先要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基础才能更为扎实和稳固。这方面的处理也多有失误。

第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形成一个自由言说的思想市场。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以及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对言论自由设定了范围和限制，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的第一场大辩论，因陈云春节讲话纠偏而转向，形成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大批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写信，在商品经济前加上“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定语，获得邓小平和陈云肯定，才将其写进《改革决定》。第二场辩论中，皇甫平传达邓小平思想，受到中央主要报刊的全面批判，第二年邓小平南巡发动反击，理论界接受了上次不战而降的教训，几乎都在工具论意义上接受了市场经济，14 大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可见，两次理论辩论都有保留，形成的共识似是而非，辩论的方式也是隔空喊话，邓小平甚至倡导“不争论”，始终未能形

成一个自由言说的思想市场。现在更没有了自由讨论的空间。

第五，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时进行，相互促进。我们的经济改革的确有不少创造和突破，比如，后面要讲的双轨制、地区竞争、农村承包等，但政治改革善乏可陈，其最大成果是打破了干部终身制，实现了年轻化，但没有坚持下来。搞乡镇直选试点发生了扭曲，不了了之。不仅行政官员由组织部门管理，国企老总也由党委任命，甚至连非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也要建立党的组织。总之，大陆初期的政治改革左顾右盼，保留太多，后期放弃，经济改革也就难免走回头路。

第六，中国改革其所以推动了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是由于政府放松了管制，使老百姓有了自由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中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复生和发展，而不是国有经济的扩张和壮大。这些后来都发生了反复。地区竞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地方竞争不同于市场竞争，在政府官员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框架下，其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此消彼长，现在不仅扭曲了政府行为，也扭曲了市场行为。

第七，取消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再加上农产品提价，一举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问题，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但 82 宪法规定城镇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以宪法侵权的方式推动改革，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不仅再次剥夺农民，形成了土地财政，而且成为农村土地市场化的障碍。金融改革虽有前进，但立足于控制而非放活，结果是地价、利率、汇率三大价格仍处于扭曲状态。

第八，双轨制是中国改革的创造，因为改革过程总是两种体制并存运行的过程。它能够照顾到受损者的利益，使改革易于启动和进行，但也容易造成扭曲，为旧体制复归留下空间。因此双轨制不可久拖不决，更不能长期实施，改革的时限也不能过长。对此，决策者应当清醒，必须创造条件尽快并轨，但我们在很多方面将其固化，以至 40 年过去了，还在谈改革。

第九，改革需要方向明确，目标坚定，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虽然会遇到障碍和挫折，但不应改变方向，放弃目标。8964 是中国改革开放遭遇的最大挫折，尽管邓小平南巡力挽狂澜，重回改革开放，但方向和目标已经偏移，此后虽然改革还在推进，但路径依赖已经发生了锁定。

第十，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因此，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理念、素质和能力非常关键。只有牢牢树立了现代思想和现代观念，决心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改造，才有可能引领中国回归和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没有现代思想，但还有自知之明，眼睛向下，善于学习，问题也不难解决。怕就怕不懂装懂，刚腹自用，唯我独尊，到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又迷恋权力，盲目蛮干。这样做就没有不失败的，中国的前进和发展必将遭受巨大挫折。

五，趋势预测

2019 年，全球经济走低几乎成为所有机构和人士的共同预期。世界银行称之为“阴云密布”，并调低了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期。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 2.9%，2020 年增长 2.8%，均低于去年 6 月预测 0.1 个百分点。这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第二年，2018 年 3%，2017 年 3.1%。其中美国维持在 2.5% 不变，但低于 2018 年的 2.9%。欧元区 19 国增长 1.6%，低于去年的 1.9%。中国增长 6.2%，低于上年 6.5%。只有日本的经济增长从 2018 年的 0.8% 上调至 0.9%。世行还预测，2019 年的世界贸易从 2018 年的 3.8% 和 2017 年的 5.4% 放缓至 3.6%。其原因在于中美贸易冲突，美国加息和美元升值，金融市场无序性增加，英国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双方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影响与之相关的东欧和北非国家。经合组织根据先行指数也认为全球经济将进一步放缓。牛津经济咨询社认为，欧洲经济增长疲软，主要是作为火车头的德国增长乏力，2019 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 1.5%，比去年 3 月普遍预测低 0.4 个百分点。CEEM《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指出，2018 年第 4 季度中国外部经济景气程度继续下行，CEEM-PMI 为 53.3，较上季下降 1.5 个百分点。美国和欧元区经济景气程度明显下滑，全球经济景气进入周期下半场。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预期基本一致。

国内经济下行的趋势已很明显，且内外形势趋紧，即使中美贸易谈判能够达成某种谅解，中美争端也会长期化，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定”，强调化解面临的风险，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调。据此，对 2019 年第 1 季度和全年的经济预测如下。

季度 经济指标	2018 年全年 (实际)	2018 年 1 季度 (实际)	2019 年 1 季度 (预测)	2019 年全年 (预测)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GDP	6.6	6.8	5.9	6.0
工业增加值	6.2	6.8	6	6.1
固定资产投资	5.9	7.5	6	5.6
消费品零售额	9	9.8	8.9	8.8
出口	7.1	7.4	-1.0	3.0
进口	12.9	11.7	10.0	11.0
消费物价	2.1	2.1	2.3	2.2

注：1. GDP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 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 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9 - 01 - 25，于北京

[【返回目录】](#)

哈耶克：开放社会中的小群体

[哈耶克 奥地利裔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本文节选自哈耶克《法、立法与自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据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在大社会中必须遵循的规则所具有的那种抽象性质的抵抗，以及对于那种被我们视为是合乎人性的具体者的偏好，都只是一种标示而已，它表明我们在道德上和智识上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到能够满足那种非人格的整体人类秩序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要在理解的条件下服从那些使我们有可能趋近开放社会的规则(亦即当我们认为它们是某个较高级的人格化机构所颁布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便会遵循的那些规则)，而同时又不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不幸或挫折而去责备某个想象中的人格化机构，无疑会要求我们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运行拥有一种极高水平的认识，尽管能够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至今也只是寥寥数人。

甚至有些道德哲学家也常常迷恋于那些从部落社会继受而来的情感，而完全遗忘了对这些情感与他们同样予以褒扬的普遍人道主义的诉求是否相容合的问题进行检视或追问。的确，大多数人在看到小群体式微以及与小群体相关的某些情感消亡的时候都会深感遗憾或懊丧——在这些小群体当中，为数有限的成员是凭靠各种人际纽带而联系起来的；但是，由于在大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可能向我们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大社会，我们就必须付出这样一种代价，即所有的人向我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必须被降低到只能要求我们不采取有害行动的水平，而不能要求我们践履肯定性的义务(positive duties)。个人所享有的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一般来讲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个人为了实

现不同的目的而会与不同的伙伴合作，而且所有这些合作关系都不是强制性的关系。这里隐含的一个预设认为，任何这样的小群体都没有权力把它自己的标准或规则强加给任何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

我们知道，有一些原则在小群体中可以说是好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大社会不仅自己不得实施而且也不会允许特定群体加以实施的原则。然而，我们当中的一些未开化者却依旧把这样一些原则视作是好的原则。在小群体中，使人们团结起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乃是要求人们根据这样一项原则行事，即“如果要使人们和谐相处，那么就让他们去追求某个共同的目的”；因此，只有当人们否弃这种做法的时候，一个和平的开放社会才是可能的。小群体中所盛行的上述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力图在小群体成员中创造凝聚力的观念，它致使人们把一切政治问题都径直解释成了一个敌我关系的问题。当然，这项原则也始终是所有的独裁者屡试不爽的工具。

毋庸置疑，除非自由社会的生存本身受到了敌人的威胁，否则，自由社会就必须拒绝使用那种从许多方面来看依旧是使社会变得单一化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亦即把某个可见且共同的目的强加给该社会的做法。此外，就强制的运用而言，自由社会也不得诉诸某些在小群体中仍会对我们极有助益的强烈的道德情绪，这是因为：尽管这些道德情绪仍是大社会赖以建立的诸多小群体所需要的，但是，只要它们在大社会中得到强制实施，那么它们就必定会导致紧张和冲突。

今天，“社会正义”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返祖的方式而在对那些曾经很好地满足了小群体之需求的可见且共同的目的的热切追求之中展现自身的。然而，这种“社会正义”的观念不仅与大社会所依凭的那些原则不相容合，而且还与那些有助于大社会之凝聚力并因此而能够被真正称之为“社会的”力量相反对。我们的先天性本能，就此而言，乃与我们所习得的那些理性规则相冲突，而要解决这个冲突，我们只能够采取下述两种方法：第一，只有在抽象规则要求的场合，才能够实施强制；第二，对于那些只有通过特定结果之诉求才能够得到正当性证明的东西，必须拒绝予以实施。

颇为遗憾的是，那种使人们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协调千百万人的不同努力进而构成人们生活之基础的抽象秩序，却不能建立在像“爱”这种被小群体视之为最高的美德的基础之上。爱乃是一种惟有具体者方能唤起的情感，然而大社会得以形成的途径却是：个人的努力只受“由抽象规则来限定人们对其目的的追求”这项原则的指导，而不受那种向特定的其他人提供帮助的目的的指导。 ■

[【返回目录】](#)

盛洪：养其身以有为 —— 《天则年鉴》[2018 年]序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刚刚过去的一年，也许是天则所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年。磨难接踵而来，我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人们也许会问，上帝还在吗？答曰，还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磨难？答曰，为了让人们幸福。仔细想一想，万能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理想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只是他认为，人们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享受向理想社会努力的过程。所以他必须给我们一个不理想的社会，以成全我们的成就感。

想想应是如此。我们用善意回敬恶意，用法治对抗蛮力，用良知激发良知。我们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让别人知道什么是权利。我们如此微小，但护卫的道却无边无际。更在磨难之中，我们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我们感到自豪。

人间早有人窥见天意。孔子讲“儒行”，那是行为的审美。他说“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意思是“人要生，生要为。”“为”就是走向理想社会的努力，也是漂亮的行为。

在章太炎先生看来，事情太易成功，并非好事。他说“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越难成功，越需努力，越显英雄本色。

去年我们不过是过了一个增加难度的关。我们的努力与其他人一起推动了一些事情，如减税的承诺，民企的安抚，农村集体土地的交易权与开发权的法定，以及司法黑幕的揭露。这是对磨难的回报，也是我们的成就感所在。

新的一年，我们不知道磨难的程度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生，生则为。我们能决定的，就是“养其身以有为也。”

2019 年 1 月 23 日于五木书斋

[【返回目录】](#)

李南央：女儿说李锐

[**李南央** 李锐之女，九十年代初出国，先后在德克萨斯州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国家实验室，SLAC 国家直线加速器实验室任工程师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4-03-18 西祠胡同，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李锐 [1917.4.13—2019.2.16] 生于北京，祖籍湖南平江，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2019 年 2 月 16 日上午 8 点 32 分，李锐在北京医院逝世。

父亲现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知道的第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李锐，读的第一本中文书就是《庐山会议实录》。

父亲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产党里的经历，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只不过使他这个人更具传奇色彩，使他的知识更特殊。没有多少人看重李锐，谈及李锐，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共产党多大的官。人们谈及的是李锐其人。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

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小时候 2 岁进幼儿园，7 岁进小学，都是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很少在家，因此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薄。他 1959 年出事，我连他当毛主席秘书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南海小礼堂看京剧，见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我们才有此殊荣。以为戏票是爸爸买的，正巧赶上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也来

看戏，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运。

李锐走了

北京时间2019年2月16日上午8点32分父亲李锐走了。他是2018年3月3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在能够坐起的那些日子里，他坚持练习写字，在一张又一张纸片上划下的是同样的内容：

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这四种限制：

时代

知识

思想能力

个人品德

（马恩列斯毛也不例外）

父亲说，前三种限制是恩格斯说的，最后一种“个人品德”，是他加上去的。这四种限制，李锐也无法摆脱。因为人的世界里，没有神。

李锐走了，我希望随着他的离去，“跟随旗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在中国也永远地走入历史。李锐走了，我们还活着。我们只需追随自己心灵的召唤，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尊严，为了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表达，努力地、坚韧地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谨以此纪念我的父亲。

谨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一生追求的“宪政开张”继续前行！

李南央

2019年2月15日

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讣告截图

我9岁时，爸爸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回到北京，住在水电部的单身宿舍8号楼，我们与母亲住在后边的9号楼。虽然只有百米之隔，却似有万里之遥，母亲通常是不准我们去8号楼的。偶尔父亲用电炉子烧些清墩甲鱼类的好菜，偷偷让家里的老阿姨传话给我和哥哥，我们就去爸爸那里“蹭”一顿饭。爸爸只有一个电炉子，所以只有米饭和炖汤吃。爸爸也没有吃饭的桌子，他有一个三屉桌，但是那上面总是堆满了书籍、纸张，没法当饭桌用。爸爸总是用一张小方凳当饭桌，我们就坐在矮板凳上围“桌”而餐。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问问爸爸，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妈妈要跟他离婚。既然妈妈说爸爸犯了大错误，而且爸爸也没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一段，那妈妈的话是不会错的，理儿一定是在妈妈那一边。

那时候犯错误的人很多，所以我对爸爸能够犯错误并不奇怪。作为少先队员是要划清界限的，但是怎么划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话让去吃饭，直觉地感到，若不去，爸爸会伤心的。就这么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

从感情上说，尽管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很少见到爸爸，爸爸也很少过问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其实和爸爸是近的，因为爸爸实在是比妈妈和善许多。现在回忆，还真想不起爸爸给过我什么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显然是让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后来老骂我小李锐，说我爸爸喜欢我的小聪明，不给我好影响。我也常常以这三件事在心里替妈妈做佐证，认为妈妈骂得也不无道理。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在燃料工业东郊小学上学住校时。那时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绩册带给家长，让家长看后签字，再带回学校交给老师。有一次我的一门功课得了2分，这在我可是从没有过的坏事，真地不敢让妈妈看到这个2分。成绩册揣在书包里带回家，看到妈妈那天不知因为什么气色不好，没敢拿出来，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学校。

可是没有家长签字，老师那一关过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妈妈的字体在家长签字一栏签上“范元甄”三个字，居然蒙混过关。到了学期末，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妈妈就是查看期末成绩和操行评语。心里打着鼓，递上了成绩册，希望妈妈看不出破绽。没想到妈妈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2分“咦，什么时候有过一个2分？我怎么不记得看到过？”再往下看，“咦，我签过字，怎么会不记得呢？”

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虚。仔细辨认，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签字？”爸爸坐在沙发上妈妈的身边，也生气地说：“什么，冒充妈妈的签字，这还了得！让我看看。”

拿过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像，这孩子学得还真像。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嗯，这孩子聪明，真聪明！”妈妈更生气了，“你还夸她聪明，这是耍小聪明！最要不得的坏品德。李锐你就是爱耍小聪明……”

爸爸一看势头不对，妈妈要转移目标，赶紧唬下脸来，“得了2分要让家长知道，瞒了一时，不可能永远瞒下去。记得那本书《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吗？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记住没有？”那是本苏联儿童读物，讲的是一个孩子开始犯了一点小错，不敢承认，谎话越编越大，最后酿成大错。是妈妈为了教育我改掉爱撒谎的毛病专门买的。

我那时虽然不很明确地认识，孩子爱撒谎，其实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只是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个坏孩子，可是要改掉撒谎的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赶紧点头，“记住了。”妈妈还要发作，我赶紧溜之大吉。我后来把这段故事讲给女儿听，连她都说：“外公也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个非常出圈的人。

另两件事，是在爸爸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赋闲的那段时间。虽然离了婚，妈妈还是认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们的义务。爸爸会定时被妈妈叫到我们住的9号楼，为我们看作文、日记，修改文字。爸爸确实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从不对文章的立意和观点进行评述。

但是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颂党的领导的作文。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要不是有党的英明领

导，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我们国家不可能没有死一个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死一个人呢？”问问题的语气显然让我感到他是在说：“我们国家死了人”。

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师和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后半截咽了回去，那时还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你怎么这么反动，敢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国家死了人！难怪你犯错误。”爸爸一句话也没再说，轻轻叹了口气，继续看下去了。我哪里知道爸爸不是“认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亲眼看见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点丢在那里。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记。我记着：“今天天气真热，本想买根5分钱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锋叔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没有买。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爸爸问：“不吃冰棍就是学习雷锋了？”那口气是有点讽刺。“那当然，我们学习雷锋就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张嘴就来，仰着头颇有向他挑战的味道。爸爸又沉默了。

多少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两件事，方才悟出，父亲是在试图用他的思想影响我。想用他见到的事实让我了解学校以外的现实社会是什么样，今后才不会彻底地幻灭。他想让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人的品格实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变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决绝的回答吓回去了。

他大概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抗争。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党的宣传所蒙蔽，所奴化，他难过吗？还是根本放弃了努力，认为：“还是让自己的女儿随潮流而动吧，这样对她的前程好，否则这个世界上只无谓多了一个小李锐，于事何补？”

这些事不知父亲会不会记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后期，就是他仅有的那两次尝试，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要找到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见，他一定会告诉我中国是怎么了，毛主席是怎么了。

爸爸这种“出圈”的个性可以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2年的流放、贬逐，8年的单间囚禁，没有让他“改头换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结论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亲。我与我的先生悌忠陪老头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规蹈矩，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一日陪父亲去长沙的一家内部书店，那个年头能进内部书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连雨果的《悲惨世界》都只有内部书店有得卖，更不要说那些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这样洛阳纸贵的书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几天前还是“狗崽子”的一介贱民，进了书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着那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书籍，犹如近神灵一般，大气都不敢出，在书架、放书的书桌前留恋往返。

父亲一眼看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抓在手中：“这套书我要了。”守在一旁的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书名，说：“对不起，这套书已经让别人预定了，明天来拿。您要是要，我们可以再为您订一套，

您以后来取。”老头子无奈地放下书，又去别的书桌转悠。挑够书之后，又返回到那个书桌前，抚摩着那套书，恋恋不忍释手。悌忠抱着老头子和我们自己挑好的书跟在身边。

老头环顾左右，见服务员在招呼别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个眼神：“拿走！”悌忠一时没有理解老头的意思，“什么？”老头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书，“拿到付款台。”悌忠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头的意思是要蒙混过关：里边的服务员知道这套书已订出，收款台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里说：“蹲了 20 年牢，怎么刚放出来就如此胆大妄为，要让人抓住呢？”

但是岳丈老大人的话是不能违背的，赶紧拿起那套书，放在其他的书底下，匆匆去付钱。付清款，赶紧让收款员把书用纸包了，这样就看不出内中是什么书了。老头又悠悠地挑了几本其它的书，交了钱，走出书店，悌忠的脊梁已汗透了。上了车，父亲哈哈大笑：“好！悌忠，干得漂亮！”



悌忠自然高兴通过岳丈大人的考验，但是对老头儿的我行我素，并不敢苟同，更何况十冬腊月出过汗可是透心凉。悌忠算是领悟到老头为何会有 20 年牢狱之灾的一二：“办事太出圈！”不过自此老头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实实在在的岳丈大人，一个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总有几分距离感的“高干”。

后来悌忠与我父亲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去云南出差，云南省电管局的同志告诉他：“你那个老丈人可真是厉害，复出后第一次来云南就是个下马威。”那时局领导汇报工作，都是照稿宣读，怕犯政治错误。刚读了个开头：“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

老头子就不耐烦了：“能不能不说这些套话，说点儿实质性的问题？”那位局领导当时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嗫嚅两下又开始从头念起：“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这

下可火了，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长，党组成员，你归谁领导我还不知道，还用你告诉我？如果除了这些话你不会说别的，就不用讲了！”好家伙！那位领导那叫下不来台！

多少年后，我们到了美国，有一天闲聊起来，悌忠谈起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后合，更明白了老头子为什么总是“上下不得烟儿抽”。可又实在感叹“老头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没改了他的秉性。

记得爸爸在1950年代初当水电总局局长时就发有“谬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老老实实让人家知识分子来干事。”那时候说这种话，竟敢把老干部称作“老狗”，怎么能不把人得罪光了？

他在共产党里实在是太个色了。体育比赛中、战争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会有出奇制胜的功效。可在共产党的天下，不循规蹈矩，处处和当今潮流逆着动，和流行思维拧着劲儿，只能是一输再输。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辈子总不得意，总不招人“待见”，刚才好好干上几年，却又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打入冷宫。他这辈子在台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只有两次。

一次是1950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朝气蓬勃，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他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领头人。团结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留用知识分子，吸引了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服了毛泽东，使得国务院重视了水力发电，认识到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水利资源。全国的江河流域，电站的开发堪点，他闭着眼睛都能指出来。北京及各大行政区都成立了勘测设计院。正因为他，那些旧知识分子佩服了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可惜好景不长。反右、反右倾政治风一刮，他就彻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后，牢狱20年后复出，全国百废待兴，水电事业被反对搞水电的人利用李锐反党集团的罪名，整得几乎不复存在。父亲刚刚出来时住在招待所，那些当年的旧部几乎踏破了我们的门槛。他收集旧部，招揽新人，恢复勘测设计院，恢复水电的地位，又树起“反对”建三峡的旗帜，让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留给水电业不多的钱，用在实处。干了三年，四处被人掣肘。65岁，自知不能为人所容，无法成事，自动“到点下岗”。

没想到又被陈云硬拉去中组部主持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刚坐进办公室，就有人送来了一份名单，是子弟们应该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规矩送上门了，聪明人会接过来，即使不全照着做，也会点头答应适当时候考虑办理的。可老头不但不接规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单当着来人扔进抽屉，心说：“你把老子当成让你们这些娃娃耍的人了！”

父亲大张旗鼓地按“四化”标准开始了选择第三梯队的工作，并且如当年搞水电般，理论先行。他的文集《培养一代新人》激动了多少老三届的心。不守规矩呀！结果只能是“下台”。

有一个和我很熟的高干子弟，一天骑车上班遇到一起，他埋怨说：“你们家老头子实在太那个，要是当初把我们都安排了，现在到处都是自己的人，何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有时我的继母也实在忍不

住，在饭桌上唠叨他几句：“人家现在办事哪个不给自己留后路，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就给人家安排了，又怎么了嘛？”

父亲立即变了脸，啪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那我还叫什么共产党员！”谁说老头没有规矩，他心里头自己的规矩大了，谁也说服不了他。

有一句话不假，“公道自有人心在”。父亲离开中组部后，部里很多人说：“李锐一走，组织部就没有思想了。”父亲听了觉得安慰。父亲的老朋友李普伯伯一次问我，“你是怎么看你父亲的？你觉得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说：“他跟大多数的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做为科学来做。干水电，那是科学建国，不是要干成什么‘三峡’那样的世界最大，为自己树碑立传。干组织，那是科学选拔人才，用人治国，不是编织个人网络。他实在是你们共产党里的一个异数”。



1963年11月，李锐下放劳改前，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及幼女范茂合影

爸爸从北大荒回来，在京赋闲，等待甄别。妈妈在赌气的情况下和他离了婚，一纸揭发，使父亲在7千人大会后，恢复党籍、暂按局级降级使用的希望成了泡影。父亲后来被送到了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劳动改造，常常给我们孩子来信，说在那里当小学教员，教国文，劳动锻炼种树。

我那时已进中学，在争取入团。就写信告诉他我不再给他写信了，要跟他划清界线。我的年龄、我的阅历和我所处的环境，都不可能使我知道，那对父亲是怎样残酷的一件事情。我那样做了，做了一个毛主席教导下的革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我后来去磨子潭看望父亲，他拿出当年我和哥哥给他的信。那些当年用困难时期粗糙的纸写的笔迹幼稚、内容幼稚的信，被父亲珍藏着，平平地夹在硬纸夹里。我才知道那些我们不经心写下的信，

对他是怎样的安慰和温暖。

我在摘下红领巾的当天入了团，真是放下了好大一个精神负担，我很怕因为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入团。没有了组织，我真地感觉像离了娘的孩子，孤独无助。自此父亲在我心里越来越淡泊。母亲经常用“小李锐”骂我，又使我更增加了对父亲的一份恨。没有他，如果我长得不是这么象他，妈妈也许不会这么不喜欢我。

大约 1967 年 4 月的一天，父亲回了趟北京。因为水电设计院的造反派写信，让他回来把寄放在我家北屋里的一些书籍和东西拿走。我正在学校搞运动，很晚才到家。一进家门，看到妈妈和父亲在客厅里坐着谈话，很感意外，一下楞在了厅堂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半天、半天憋出了两个字：“爸爸”。

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妈妈准要骂我划不清界线了，是假团员，一遇真刀真枪就露馅儿了。自己也觉得实在是经不住考验，与反动父亲不能一刀两断。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慈爱地说：“都长这么高了。”妈妈说：“你们到南屋去说话。李锐我和你没有话说了。”

我和父亲进了我和阿姨住的南屋，彼此干坐在那里，半天无话，都觉尴尬。还是爸爸先开的口：“听妈妈说，你因为爸爸的事，在学校挨了同学的批斗了？”我只简单地“嗯”了一声。爸爸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矛头绝不止是简单地对着“三家村”，北京市委。毛主席还有更大的目的。

我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当然是不信。但是否应该当成“大大的反革命”言论向校工作组汇报呢？我到底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奇怪的是，父亲走后，妈妈也并没有盘问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在刘少奇被揪出来后，我才告诉同观点的同学我爸爸的预见。不过加了一顶帽子，“他的反革命嗅觉真够灵敏的！”

爸爸说，他把日记交给了当地的革命群众，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改造自己。因为他在日记里写了希望有一天能够“翻案”。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做人。我对爸爸说：“我都要在这场革命中认真进行自我革命。”这次见面大约只进行了二十几分钟，妈妈进来告诉爸爸，他应该走了。

爸爸站起来，绕过隔在我们中间的桌子，面对着我，我看得出他脸上的负疚和对我的怜爱。爸爸伸出了手，想和我握别。我一下糊涂了，不知该怎么办好。到底是爸爸还是敌人？刹那间来不及判断。为了挽回刚才那一声“爸爸”的错误，我硬挺着，僵僵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爸爸好像有些意外，但是一句话没有说，就那么走了。

这一别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父亲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影，罩着我。我冲啊、撞啊；我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影。我所在三线工厂的建厂初期，各个车间都有青年突击队，干的是盖厂房的土方活。人家都是在突击队干个一两个月就回车间了。可我一干就是一年。评“五好战士”，顶多到班组这一级，就再也上不去。

我那时想上大学啊，想得都要发疯了。多不容易啊，车间的工人居然推荐了我上工农兵学员，可

是到了厂里：“这样出身的人，不予考虑”，一句话就判了我的死刑。有同事讥讽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也想上大学？”我深更半夜绕着塬底转啊，转啊。人家的父母挨斗，都有恢复工作的一天，可我父亲是1959年彭德怀的案子，就像一位坚决反对他的儿子和我交朋友的老干部说的：“那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真恨父亲，我恨我为什么没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直到1976年“四五运动”，那晚我是从厂里的广播听到的消息。站在冷冷风中，望着四周黑黑的塬梁，我对那时还是我男友的悌忠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那是我第一次开始醒悟，不可能人人都错了，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对的。我想起了父亲对我有过的暗示：“三年自然灾害死过人”。我那时自己已在农村呆过。在山东平度县城关村住时，老乡告诉我家家都死了人，无户幸免。

老乡听说我父亲是彭德怀案子的人，居然说“自古忠良没有好下场，你父亲是冤屈的。”我可一点也没有认同，觉得农民的觉悟真低。但是死人是相信了，就是没敢动怀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根儿筋。

这时候我已经早就知道父亲当过毛主席的秘书，想到父亲也许知道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才会反对毛主席，也许我的父亲是对的。我要找到他，要让他告诉我他知道的事实。



1958年3月，李锐陪同周恩来查勘三峡坝址

恰好那时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总理视察新安江水库工地的照片，站在总理后侧的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父亲。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说那人是我父亲，你们登出他的照片，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

《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组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总理后面的那人是谁，也就无从知道他的下落，要我到他的原单位打听。我当然不敢整出那么大的动静。

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记得她叫李琬华，是在湖南体委工作的。因为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

过她在全国篮球联赛当裁判。那时哪有几个女裁判，很是风头，所以就记住了她的职业。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想到，只要父亲还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不死心，再发。这次写上了李婉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想着如果有认识姑姑的人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没准儿会转给她。果然大姑姑已经退休了，根本不去单位，第一封信自然没有见到。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友见到，知道是家信，拿回交给了大姑。

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一下子脱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接下信，几下子拆开，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她立即提笔给仍囚禁在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

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当年离别父亲是以不认他而分手的，但是父亲对女儿的心始终没变。和大姑姑联系上，知道父亲还活在人世，只是健康情况很差，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

那时“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是还没有清算他们的罪行。上面的一切还是正确的，这么做是有风险的。悌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

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地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我自己却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这一步迈出去，可就收不回来了。当了二十年的狗崽子，可一直还是要革命的青年，要跟着党走，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下要让人知道了，不跟着走了，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一辈子可就真完了。

但是我生性不是个办事瞻前顾后的人，常常是一念即出，就没有回头箭了。“走！”自从认识悌忠，和他的普通百姓的家庭，我有了一个本质的转变：觉得世界上好多事都是假的，很多人的革命是假的，能不能被认可为一个革命青年已经对我不那么重要了。亲情，浓浓的亲情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如果我能找回爸爸，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知足了。

我先到了长沙大姑姑家，住进了湘雅医学院，看我多年的低烧病。见到了奶奶，表姐妹，表弟。大姑姑跟我讲了很多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也听到同辈的表姐妹们是怎么看我的妈妈和爸爸。才知道同样的事情，出自不同人的口，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是根本相反的。

终于接到爸爸的来信，说我们可以去看他。上路的头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大姑姑问我要不要等烧退了再走。想到爸爸会误解我犹豫了，不敢去了，就说：“没事，我可以走！”一路昏昏沉沉，

火车，长途汽车，大姑姑和姑爹两个老人一路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快到了，汽车的轮子却出了毛病。真好像老天让我再三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往前走。此时的我，烧倒开始退了。知道离父亲已经很近了，心情有些急不可耐。下车蹲在司机旁帮他出主意，递工具，上手修，还真把车鼓捣好了。

车开进磨子潭已近黄昏。我提着大包跟在两位老人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的平房前。平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二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一时觉得脚下有些软，不知应该怎样面对。

父亲开了门，大姑姑紧紧地抱住了他，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不能出声。姑爹嗔怪地说：“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呢。”他用湖南话跟爸爸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看不见爸爸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父亲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的距离好像一下消失了。

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像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爸爸，”久违了十二年的称呼，叫起来已不那么自然。“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不自然，急急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作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7、8平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条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减少了许多。

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架，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像当年8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东西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架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

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凳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了？”“是啊，是啊！”听到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儿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爸爸说，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听到一些外面的风声。你们来看我，特别是女儿也来了，人们有猜测，可能世道要变了，因而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那顿饭很香，大姑姑居然能在小小的煤油炉上烧出这么好的菜！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真是一个好去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

我先发的问，“你是怎么当的毛主席的秘书？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你跟妈妈当年

在延安离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复了婚？后来庐山会议后你和妈妈没离婚，为什么从北大荒回来才离的婚？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看得出，父亲对我要提的问题是早有了准备，我感到他有一种要让我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



1958年7月，李锐（右二）在庐山会议

父亲从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我闻所未闻，完全不能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人们可以从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晓梦女士的《李锐其人》了解他的故事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光描写庐山会议，就有了好多个版本的著作。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审判，中国还被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

=毛泽东在爸爸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边谈话，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一切都是和人的品格，个性息息相关。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

当领导人作为神在我心中幻灭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榜样，那就是眼前这位瘦瘦的老人。他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爸爸就这么不停地讲，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静静地，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么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二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

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的烧全退了，心里很静，很凉，很踏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第二天，爸爸拿出了一条用他的料子裤子改缝的女裤。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告诉我他和一个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裤子是他本来准备送给那位姑娘的。但是父亲因为和她的关系挨了批斗，女青年也很抬不起头，爸爸无法再将裤子送给她。

那个年代，不能希望我有什么开放的思想，和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对父亲说那是一个污点，但是我理解他，原谅他。我收下了那条裤子。姑姑让我穿上，并换上她在长沙给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的确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库去照相。这是我工作以来最高级的一套行头了。

照相时父亲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是紧紧的，我感到父亲对我的隔膜消失了。我一直想见见那个女孩儿，爸爸也说要指给我看，不知她是否故意躲着我，到走我也没看到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想着那个姑娘，觉得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就从我父亲复出后，她从来没有找过他，没有要过东西，没有要过工作，她就一定是个好人。她那时一定是真地同情爸爸，对他有感情。

爸爸带着我在水库各处转，愉快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老李，这是你的女儿啊？”“是啊，从陕西来，是工人那！”我那些天一定成了山窝窝里的新闻人物，因为人们很快就到处在谈论我的长相了：“腿有点弯，爱眨眼睛，长着两颗虎牙。”山洼洼里的人眼睛真毒，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缺陷。爸爸还带我去水库游泳。看着我瘦瘦的身材，怜爱地说：“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烧看好。吃好些，长胖些。”

接下去的几天，爸爸跟我讲了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和最后是怎么上法院离的婚。爸爸所讲的和我了解的妈妈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和爸爸开始商量如何为他的平反运作了。他的任务是写申述材料，我的任务是以女儿的身份逐条说明我妈妈对我爸爸的揭发的不实之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亲人的揭发还要亲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姑姑已经来信要在北京与我会合，共同为父亲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搁下去。尽管父亲显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势是在以天为计变化着，胡耀邦任组织部长，给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这个希望很可能变成现实。

走的那天，父亲拿出了200块钱，要我带上。我知道爸爸自1959年倒霉后，每月的工资就降为120元，60元给我们三个孩子生活费（文革开始后，我们虽然没有再拿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把这些钱发给我爸爸，仍然放在部里），还给我奶奶寄30元，自己实际只有30元的月收入，这是一笔数目极大的钱。

我不要，说我自己的工资足够了。爸爸说：“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钱。另外买几件像样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体要搞好，现在是太瘦了。”钱拿在手里很沉，很暖，我强忍着没有落泪，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爱我的父亲。

父亲送我们上了长途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直等在车外，车缓缓启动时，我看到爸爸有一种要追上来的冲动，但是他停住，在那里招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女儿，我等你的消息！”

文革后，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么回事。我告诫自己遇到多难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泪，

特别是不能人前掉泪。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我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稀疏的头发和那张充满病容但是洋溢着希望的黄黄的面孔，眼泪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按着书包里父亲的申述信，控制着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爸爸你等着我，女儿一定要让你离开这里，要为你讨回公道。”

其实正像我同样是老干部的二姑爹在北京对我说的，“你父亲的问题早晚会一风吹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对父亲问题性质的改变没有任何作用。他的问题和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问题的结论是连在一起的，党纠正了当年自己犯下的错误，李锐的问题自然就一风吹了。

我相信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偷书”，“大水电主义”……的罪名，在平反时其实并没有一一查证，因为那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东西。二姑爹是谙熟共产党的斗争之术的，而我以前一直把党看得是十分崇高的。

亲人的奔走其实只是为了唤醒那些复出又恢复高位的，当年把父亲赶下台出过拳，伸过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们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经历，对自己过去的作法有所悔悟。由当年处理父亲的人站出来替他的平反说话，应该是最有力量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葆华，他对我们的态度最诚恳，他说：“当年我作错的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纠正它。”

当然冷脸看得也多。一次去一位老干部家，被一个和她家不知什么关系的穿军装的人挡驾，让我和二姑姑冷坐在客厅里，他自己仰在藤椅里看报纸。我真是觉到一种屈辱，忍了又忍，还是不客气地冲了他几句。二姑姑当时脸都吓白了，看到她的脸色，我也知道我那些厉害话不该说，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这道理我懂，可作起来并不容易。

可没想到，他的态度反而变好了，给我们上了茶，最后让我们见到了他母亲。出了门二姑姑就说：“好家伙，你和你爸爸一样，这么大的脾气！以后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了。我们是在求人办事，什么脸都得看那！”我无言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奔走也使爸爸的那些亲密好友知道了他的下落，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开始给父亲通信息，那些信是他等待平反结论难熬的日日夜夜的甘露。父亲就是在黎澍伯伯的鼓励下，在复出前完成了《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修订本。

1979年元月1日，父亲一封“中央通知，四日返京”的电报，将我从陕西岐山县五丈原下的工厂召回北京。办正式离厂手续，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做书面鉴定时，被正在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扫见了。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写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当时就讽刺书记说：“你们早干嘛去了？”

我的信仰、我对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彻底地垮了：“自己过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亲的一纸平反”，感到了一种被愚弄了的深深的耻辱。后来不止一个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劝”我入党，说组织部副部长的女儿不入党太说不过去。我起初是搪塞，后来干脆说：“你别劝了，从我父亲平反那一天，我就不信共产党了。”

父亲不久重新组织了家庭，我和悌忠带着孩子也搬入了自己的小家。各人忙个人的，我又常在国外工作，竟再难有机会与父亲促膝长谈。

1993 年父亲接受邀请，到科罗拉多大学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洛杉矶，圣迭戈、哈佛、科罗拉多我一路陪他，又有了一次难得的和他日夜相守的机会，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场合下父亲做人的另一面。他每到一地，就被当地的大学邀去做讲演。不少同学都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心。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当年参与选拔的干部，现在在各级岗位上，在实践中证明大多数是好的，是挑得起担子的。有这些人在，中国是不会垮掉的。

坐了二十年的牢，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罪，1989 后又挨批斗，他总是那么乐观，越来越想得开。在科罗拉多开会，当地报纸记者采访他，他对记者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敢讲真话，说无非是五怕嘛：一怕杀头，二怕丢官，三怕开除党籍，四怕坐牢，五怕老婆离婚。我这辈子除了没有被砍掉脑袋，是哪样都挨上了，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就像美国人常说的“piece of cake”。

美国一家制片公司摄制纪录片“中国革命”，制片人采访他，问他：“你这一辈子二十年人生最好时光在坐牢和流放中度过了，个人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回首往事，你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非常痛苦？”爸爸说：“历史就是那个样子，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样子，你又有办法？把个人放进历史中去想，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就是那么回事。”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一番话，说得那位女士热泪盈眶。

那次在美国，父亲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作了那么多讲演，没有对曾经的领导人作过一句极端、刻薄的评价，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有过一字的攻击和诽谤，尽管他在底下和人座谈时很随便，很尽言，但在公开场合十分严谨，“滴水不漏”。科罗拉多的《星报》将此评论为他政治上的谨慎与成熟。

但我觉得不完全如此。共产主义事业是他年青时代就信仰、向往，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他二十岁上就加入并为之抛弃了一切个人得失，鞠躬尽瘁的政党，这个党，这个事业在中国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 1989 年后，竟然……他的痛心，他的痛恨是刻骨铭心的，是我辈不能比拟的。

不过他和许多“持不同政见”的老年人不同的是，他非常超脱，超脱的大智、大仁。我非常欣赏他在加大洛杉矶分校讲演中的一句话：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已经很老了。我现在的责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研究我们党的，毛泽东本人的历史教训，使后人能引以为鉴，不重蹈覆辙。至于怎么改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民主强大的国家，那是你们年青人的事情，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想，这才是爸爸从不在正式讲演、不在正式出版物上骂共产党，骂毛泽东，他私下也从来不说：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我对它深恶痛绝之类话的根本原因。

他力求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样就可以“心静”。他真情实意地把肩上的“革命重担”交给下一代人去挑，他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已经不多的时光投入到“著书立说”中去。他才可以完全撇开个人的恩

恩怨怨，从历史的，客观的，辩证唯物的方法去写“庐山”，去写“毛泽东的早晚年”，去写“大跃进”，去为反对“三峡工程”、“奋战”到底！

爸爸不止一次地，真心真意地对我说：我在国内交了很多青年朋友，现在的年青人中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这次在美国又碰到了不少有头脑，有水平的留学生，这些人是中国的希望。他从小心里觉得搞现代经济，搞现代政治，搞现代民主，自己是老了，比不上年青人。这些年青人能看得起他这个老头儿，他很以为骄傲，常常以此沾沾自得：“我这个老家伙还不招人讨厌吧？”

父亲的地位在党内实在不能算是太高。可是他的才华，他的德行，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内却是少有的。记得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他并不与其过深交往。可是耀邦倒了台，他却上赶着去“巴结”。又是探望，又是改诗，又是倾心交谈。临了还不识实务地为耀邦翻案，捅了“马蜂窝”。胡乔木是国内很多知识分子，很多老干部所痛恨的“左王”。他临终前，爸爸却去医院看望了他，还参加了追悼会，安慰了遗属。

那次在美国，很多人当他的面骂胡乔木，他总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我写《庐山会议实录》是乔木支持的，后来书发行时遇了麻烦，乔木还特意对我说，是他让我写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承担责任。爸爸对我说：“我算是对得起乔木了。”他并不是不恨胡乔木的“霸行”。他曾忿忿地说：“胡乔木混帐，连王若水这样好的人，党内第一流的理论家都不能容！”可是他还是念旧情，念及庐山那段的“知心”，念及胡对他写“庐山”的支持。胡乔木为了改薄一波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下了大功夫，可死后家属想请薄写写纪念文章，薄不理不睬。

比起这些高官达贵，爸爸是太有人情味了。我常想，共产党如果多讲点儿人与人之间的爱，多容忍些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中国的情况就会不同许多。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它了。其实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它的气味。那些反对它的人士，身上就有着太多的类似于它的仇杀心理，他们说到它，总让人嗅到些血腥气。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痛骂，推翻，打倒，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去客观、历史、理性地分析这样一个在初期充满了活力，感召力，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为之捐躯的政党，如何升至颠峰又走上腐败，与初衷相悖之路。如果年青的，有志于参予政治，治理国家的一代精英们，能真正从共产党的身上吸取应有的教训，逐步完善出一种全新的，民主的，科学的，充满博大爱心的治国韬略，我们这些凡人就真是看见希望了。

父亲自己说他是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真的，他与我们聊天简直就是上政治课，没有什么家常话。我们来美国后，父亲的信极少，偶尔来信，也是勉励要上进，不要只挣那一点小钱，要争取多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

父亲这辈子除了1958年被毛泽东夸为“红旗干部”，文件发到全党，似昙花般“美”了一阵，就总是挨批，就是挨斗，再不就是坐牢。在国内正统的宣传中，他似乎永远是个反面人物。可你要

问我，因为这个父亲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梦想，儿童、青年、直至中年都还要受到他沉浮的牵连，我现在是不是很希望没有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父亲？我从心里告诉你，我庆幸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庆幸有过这个父亲带给我的那一切，无论是苦难、幸福，那都是无人可与我相比的财富。

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要对得起历史。这是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愿与朋友们共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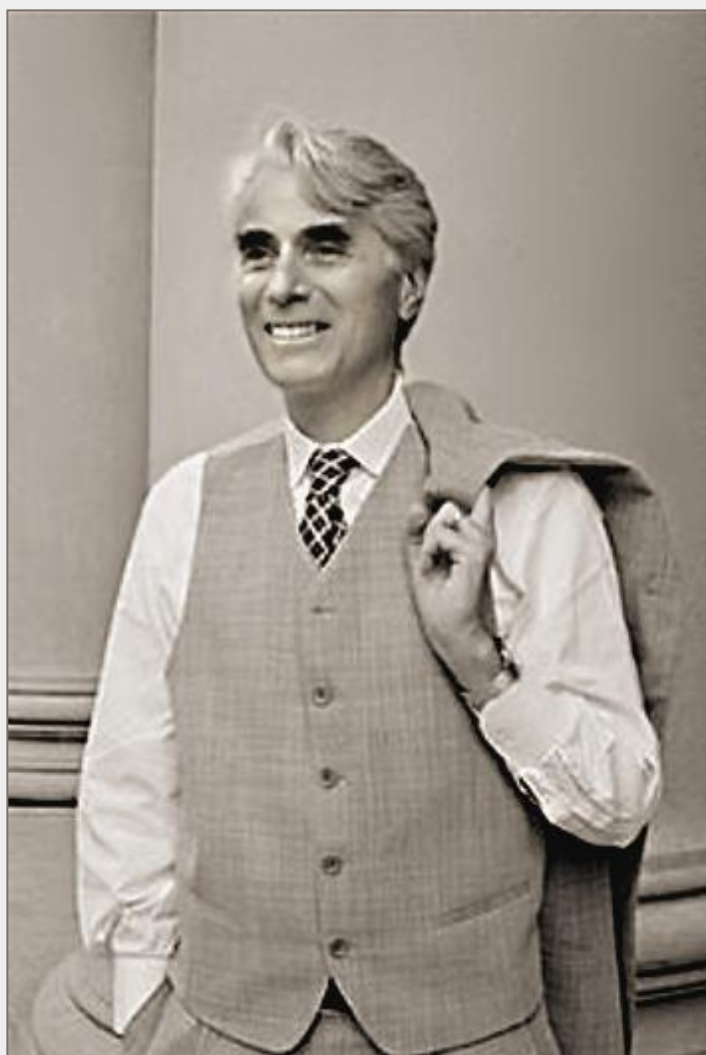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周保松：苏格拉底式的一生：诺齐克的哲学人生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转载自 2015 年 6 月 14 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图片与说明为编辑所加]

尼采曾要求：你应如此活着，一如你愿意这样的生命可以永恒地重复。那似乎有点苛求了。然而，哲学，却确实构成一种生活方式，值得延续至其终结。一如苏格拉底最初向我们示范的一样。

—— 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罗伯特·诺齐克 [Robert Nozick 1938.11.16 日—2002.1.23]
20 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与约翰·罗尔斯同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苏格拉底的困惑》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他之前出版的不同性质的论文，甚至有哲学小说，可说是相当奇特的一本著作。本文不拟在此详细介绍此书内容，而是尝试为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绘一速写，以让读者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个较为整体。

诺齐克生于 1938 年 11 月 16 日，父亲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经营小生意。诺齐克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这段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左”，他的论证显得愈有说服力。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好，这些论证都是对的……’然后去到某一阶段，我的思想和内心终于变得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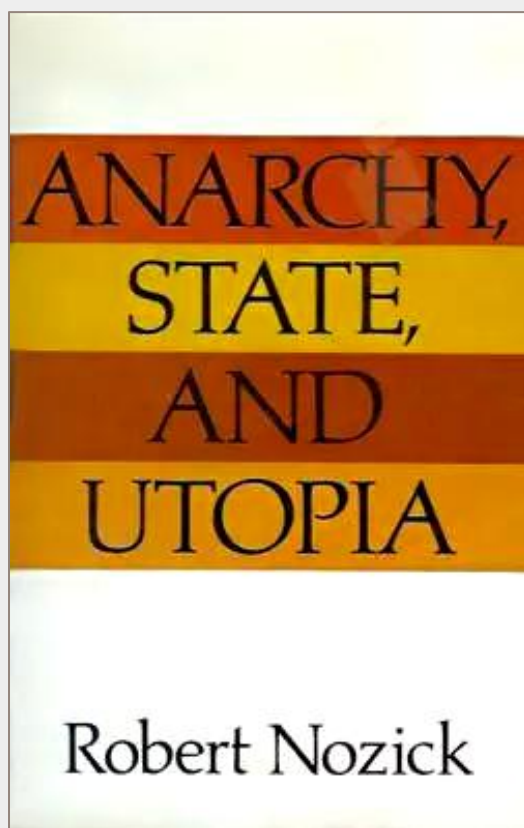
诺齐克的哲学启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曾自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手拿这本书在布鲁克林区的大街闲逛，渴望得到大人的注意。他虽然只读了一部分，而且也不大懂，“但却被其深深吸引，并知道内容十分美妙”（*The Examined Life*, p.303）。但真正令他投入哲学思考，并决定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却是哥伦比亚的哲学教授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事缘在一门有关二十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课上，诺齐克提出任何想法，摩根贝沙都可以提出质疑，指出他的观点要么忽视了某些重要分别，要么忽略了其他反对的可能性。诺齐克愈受挑战，愈希望将问题弄清楚，结果他上齐了所有摩根贝沙开的课。后来他戏称，他是“主修摩根贝沙”（major in Morgenbesser）。

1959 年毕业后，诺齐克旋即转往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Hempel），1963 年以《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为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探讨理性选择的规范条件以及博弈论中的一些问题。诺齐克接受的完全是正统的分析哲学训练，最早关心的是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解释（explanation）的问题。毕业后，他获奖学金往英国牛津留学一年，并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及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任教，最后于 1969 年回到哈佛，以三十之龄，担任哲学系正教授（在这点上，诺齐克和罗尔斯的经历甚为相似。罗尔斯也是在普林斯顿毕业，然后往牛津留学一年[1952]。但诺齐克并没有提及过牛津生活对他的思想有何影响）。而在罗尔斯的鼓励下，他和内格尔（Thomas Nagel）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伦理及法律哲学学会，每月定期进行学术讨论，出席者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沃尔泽（Michael Walzer）、汤姆森（Judith Thomson）等当代著名哲学家（英文全名是“The Society for Eth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简称 SELF。这个学会的讨论孕育催生了不少重要的道德及政治哲学著作。）年轻的诺齐克在同侪之间，最有名的是他那摧枯拉朽般的分析能力。早在普林斯顿时，他已成为很多访问教授的严峻考验，因为他总能在别人看似密不透风的论证中找到漏洞，锲而不舍地将对方的观点拆解到分崩离析为止。这种不畏权威、追求原创性、认真对待各种可能性及反例的态度，是诺齐克一生研究及教学的最大特点。他不仅待人以严，对于自己著作中论证不足及悬而未解之处，也会在行文中公开承认，并邀请读者继续思考下去。

1971 年是当代政治哲学史重要的一年。该年罗尔斯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正义论》正式出版，并由此激发了诺齐克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念头，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诺齐克后来回忆，这多少是一场意外。该年他正休假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打算写一本有关自由意志的书。他之前早已读过《正义论》的初稿，也和罗尔斯进行过深入讨论，自己对放任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亦

有一些构想，但政治哲学始终不是他主要的学术兴趣所在。谁知几个月下来，有关自由意志的思考毫无进展。而读完罗尔斯大幅修订后的新书，马上令他改变方向，展开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建立自己的正义理论。

诺齐克有关社会正义的论证有几个步骤。第一，他首先指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最根本的是自我拥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以及免于外人干涉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一种诺齐克所称的道德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禁止任何人用整体利益或其他价值之名，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权利的至上性构成诺齐克整个理论的基础。但拥有自我，却不表示人自动有权拥有外在世界中本来不属于任何人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因为资源有限，而每个人总想占有更多的财产。诺齐克于是提出一个有关土地及资源占取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他认为，只要人们满足一个洛克式的附带条件（Lockean proviso），也即在占取时没有令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坏，例如留给其他人足够多和同样好的资源，这种占取便是公正的。这是第二个步骤。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初版封面（1974年）

紧接着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有权拥有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呢？这是有关转让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transfer）的问题。诺齐克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最初的占有是正义的，那么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物品的任何转让同样合乎正义。“从一个正义的状态中以正义的步骤产生出的任何东西，它本身便是正义的。”这是第三个步骤。诺齐克指出，除了重复应用这两条原则，没有人有资格

可以正当地持有任何物品。但当有人违反这两条原则时，我们则需要一条对不正义占有或转让的修正原则（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加以补救。这是最后一个步骤。诺齐克声称，这三条原则已经穷尽了分配正义中的所有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正义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社群中，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诺齐克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每个人的财产持有（property holdings），都符合最初占有和转让的正义原则，那么整个社会便是公正的。如果政府根据某些模式化（pattern）或非历史性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原则或需要原则，透过征税将我的财产强行转移给别人，那便严重侵犯了我的权利，剥夺了我的自由。私有产权应得到绝对保障，因为它构成了人身权不可分的一部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有权完全拥有自己，当然包括可以自由支配正当得来的财产，并通过我的聪明才智赚取更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不违反上述两条原则，那么最后出现的财富不均，也是无可置疑的。

基于上述论证，诺齐克因此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那有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要求只有在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分配上的不平等才能被允许。但这样一来，便形同强迫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占优势的人必须去补贴那些失败者。诺齐克认为这毫无道理。在考虑分配正义时，我们不能只考虑利益受领的一方，还必须考虑施与一方应有的权利。而差异原则背后的真正理据，正预设了人们的天赋才能并非一己应得，而是社会的共同财产（common asset），而这却恰恰违反了“自我拥有”这个基本人权。诺齐克称他的理论为“应得权理论”（entitlement theory），即一个人所应得的，必然从一开始便严格限制他人可以向其索取的界限。所以，政府的唯一职责是保护人们的人身自由及私有财产权，并确保市场能够顺利运作，而任何财富再分配都是不公正的——无论以怎样的名义。

换言之，诺齐克希望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他认为，只有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功能上最弱的国家（minimal state），才是一个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国家，其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以及确保契约的执行。除此之外，政府应绝对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及私有产权，不应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价值，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资本主义值得拥护，不是因为其有效率，不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不是因为只是一小撮富人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最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所能渴求的最好的乌托邦。

此书出版后，诺齐克很快就被公认为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主要代表，复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学理上对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及马克思主义等提出了有力挑战。而在现实政治及公众层面，则为八十年代兴起的里根及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或新右派）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正如英国《电讯报》所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历经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及卡特的国家福利主义世代后，诺齐克较任何人更能体现了新放任自由主义的精神，并将其领进里根及布什的年代。”

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得到学术界一致推崇，是因为它对国家及正义的理解，符合了很多人本身已有的道德直觉及对政府角色的理解，那么《无政府》的成功，却更多是因为它极具挑衅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主义在欧美盛行，主流观点认为要建立一个正义社会，政府便须通过累进税及其他措施进行广泛的财富再分配，缓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诺齐克却以其犀利严密的论证、活泼生动的文风和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尖锐地指出，任何超出古典自由主义“守夜人”（night watchman）角色的国家，都是不正义的。这在理性或情感上，均大大挑战了很多人的道德信念。当代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便曾指出，《无政府》的出版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件大事，因为在认真回应诺齐克之前，任何哲学家都不可再视“社会正义要求财富再分配”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是持平之论。很少人会完全接受诺齐克对国家的理解，但读完《无政府》，却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国家的性质，以及一个正义社会的道德基础何在。所以，在七十年代的哲学界，罗尔斯和诺齐克分别提供了两种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版本：一左一右。规范政治哲学在历经半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在英美哲学界蓬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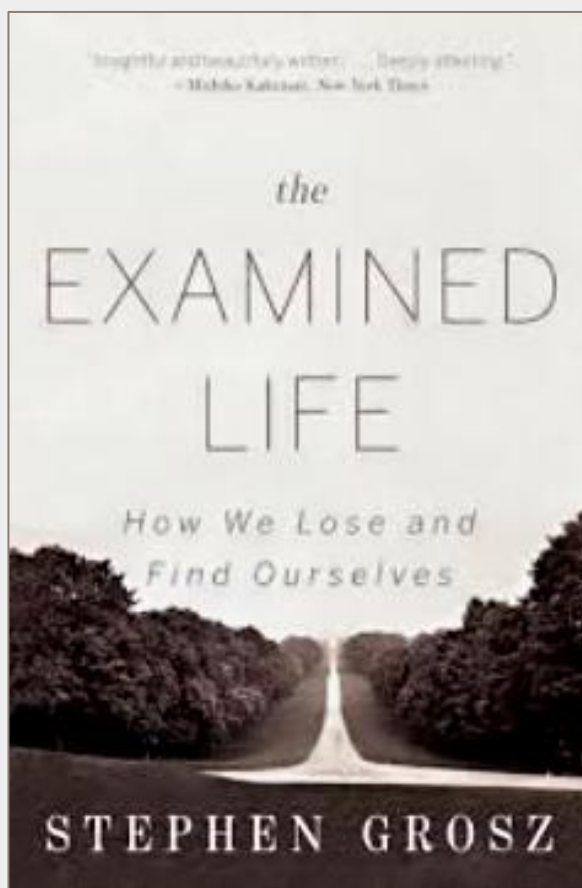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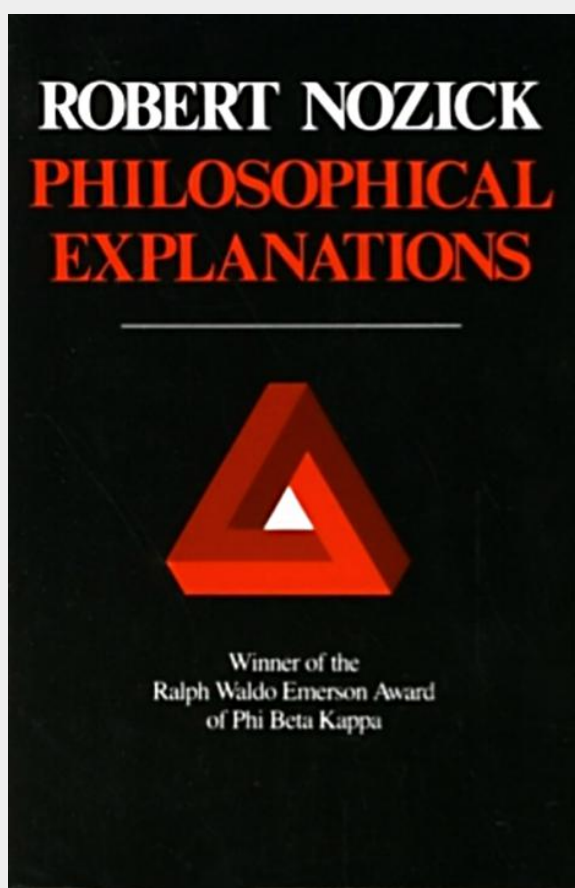
《无政府》的成功，令诺齐克这位寂寂无名的年轻学院哲学家，突然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1975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更将其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此书亦成为英美各大学教授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教材，并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中译本见：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大名初享，诺齐克似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他可以在学院继续完善捍卫自己的理论，回应别人的批评，培养自己的弟子，自成一个学派。第二，他可以介入现实政治，积极鼓吹他的学说，成为日益兴起的新右派运动的精神领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诺齐克选了第三条路。对于同行排山倒海的批评，无论毁誉，他一篇文章也没有回应过。他也选择了远离现实政治，无意成为新右派的理论舵手。他好像在学院中掷了一枚重型炸弹，然后抽身而退，任由别人在其中继续张罗摸索攻击。而他，却转往全新的哲学领域。

这和罗尔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罗尔斯博闻强记，对古今哲学很多方面均有所见，但他一生却只留在政治哲学这块园地耕耘，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建构一套正义理论，为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一如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他极有耐性，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每篇文章每个论点均反复思量、精心细琢、力求前后呼应，无懈可击。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准备《正义论》，其后又再用了二十二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诺齐克并不欣赏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正如他说：“无论如何，我相信，即使一本不那么完善的著作，内里包含未完整的表达、猜度、悬而未决的疑问和问题、各种线索、附带的联系及论证的主线等，也应有其位置和作用。对有关主题并非定论的想法，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这不是诺齐克的谦逊之话，而是他哲学书写的基本态度。他不相信哲学问题有什么绝对的定论，也很反对将各种相冲突的事物强行纳入人为的大系统之中，因为这样总会顾此失彼，扭曲事实。因此，他的作品总是试探性及开放性的，对于他自己疑惑犹豫及不肯定的地方，也会让读者知道，

并希望读者继续探索下去。

但诺齐克为何从此离开政治哲学呢？据他后来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想用一种防御性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但这往往极难避免。因为一个人愈受到别人的攻击，便愈想捍卫自己原有的立场，因此愈难看到自己的错处。更重要的是，他天性喜欢不断探索新的哲学问题，而不想毕生耗在写“无政府、国家及乌托邦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什么的回归”之类。

诺齐克这种治学态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甚至也从来不对别人对他其他著作的批评。他似乎有无穷的好奇心，探究完一个问题，便迫不及待转到另一个。这个特点在他的教学上也表露无遗。他在哈佛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除了仅有的一次，从来不会重复教同一门课程。例如在七十年代，他曾醉心印度哲学，并开了不少有关的课，也经常和政治、心理、历史、经济、神学及法律系的不同教授合作开课。他曾和人打趣说，如果要知道他下一步想写什么，最好去看看哈佛的课程目录。他最后的课，是有关俄国革命的，试图以此探讨历史的因果问题。他在去世前曾计划开一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 哲学思想的课，可惜天不如人愿。



《哲学解释》(1981) 与《反省人生》(1989) 初版封面

诺齐克的第二本书，是 1981 年出版的《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厚达七百多页，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及价值三大部分，讨论一系列康德式的问题，例如事物存有如何可能、知识及自由意志如何可能、客观的道德真理及人生意义如何可能等。其中他对哲

学怀疑论的批判及对知识的基础的看法，引起最多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中，他从事哲学的方式有了一个明显转变。他不再接受以严格演绎进行论证的分析哲学方法，因为这种从一些基本原则演绎出整个系统的进路，就如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只要底部不稳，便会整个倒塌。他转而提出一个“帕特农神殿模式”（Parthenon Model）。顾名思义，“首先，我们将各自分离的哲学洞见，逐柱逐柱地竖起来。然后，我们再在一个以普遍原则或主题的大屋顶之下，将它们联结统一起来”。这样的好处是，即使神殿某部分被破坏，其他部分依然可以屹立不倒。他继而指出，传统塔状论证结构的目的的是证明（proof），总希望以论辩的，非此即彼以及一拳击倒的方式强迫别人接受最后的结论。而他则倡议一种以解释及理解为主的哲学多元主义（philosophical pluralism），一方面在哲学解释中尝试肯定各种不兼容的观点，同时又可根据某些共同的标准将其排序。诺齐克似乎认为，在很多哲学问题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各种理论不一定互相排斥，而可能各有洞见，从不同角度对真理的探寻做出贡献。

诺齐克的第三本书《反省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在1989年出版。诺齐克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努力探求什么是构成我们人生最有价值及最有意义的东西。讨论题材包括死亡、父母与子女之爱、性，以至邪恶及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在分析哲学传统里，极少哲学家会尝试触及这些问题。诺齐克却能以诚恳睿智而说不教的方式，从现象出发，逐步带领读者进行深入反思。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诺齐克首次在这里承认《无政府》的论证有严重不足，并不再坚持早年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该抽取遗产税，因为代代累积的遗产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他同时承认放任自由主义对政府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互相合作及团结的重要性。诺齐克这番率直的表白，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也需要极大勇气。他如此剖白：“我早年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标示出一种特定的观点，一种于我现在看来是严重不足的想法（我稍后会对此再作解释）。我特别意识到，要渐渐淡忘或逃避一段智性的过去（intellectual past）的困难。其他人在对谈中，常常希望我继续维持那个年轻人的‘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虽然他们自己拒斥它，也可能宁愿从来没有人曾经主张过它。”

诺齐克的下一本书《理性的性质》（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则在1993年出版，此书主要探讨人类理性选择及信仰的性质。诺齐克基本上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综合理性决定论（decision theory）、生物学、心理学及心灵哲学等各学科知识，主张人类这种独特的能力为人类社会长期进化的结果。这本书得到哲学界普遍的肯定和重视。

1994年诺齐克被诊断出身患胃癌，医生甚至估计他最多只有半年寿命。但诺齐克对生命始终保持乐观幽默的态度，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继续著书教学，对生命没有任何抱怨。正如他说：“我五十五岁的寿命，已较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人长命了。……在我余生中，我没有任何强烈渴求去改变我的生活。我没有心怀跑去大溪地的秘密欲望，或想变成一个剧院歌星，又或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或院长。我只想

一如以往地，爱护我的妻子和孩子，和他们玩乐，并且做我平日一样做的事情：思考、教学和写作。”

1997 年诺齐克出版了《苏格拉底的困惑》(SocraticPuzzles)。这是一本以前出版过的文章及书评的文集，里面有一些颇有意思的文章，例如《谁会选择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等，最后部分甚至有数篇他称为“哲学小说”的短篇。在西方哲学史上那么多哲学家中，诺齐克最佩服的就是苏格拉底。而与书名同名的《苏格拉底的困惑》一文，很可能是他写过的唯一一篇哲学史文章。

同年春天诺齐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发表连续六讲的“洛克讲座”(John Locke Lectures)。该年在美国本土，诺齐克更破天荒地与罗尔斯、德沃金、汤姆森、斯坎伦(T.M.Scanlon)及内格尔等六位道德哲学家，共同上书最高法院，要求法院保障宪法赋予人民个人自决的基本权利，容许医生协助绝症病人安乐死合法化。在这宗充满争议及引起全国关注的诉讼中，这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笔下的自由主义“梦幻之队”，能够放下彼此的哲学分歧，联手直接参与公共讨论，在美国司法史上极为少见。而罗尔斯和诺齐克这两位一左一右的自由主义巨擘，能够在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上达成共识，共同发表宣言，更成一时美谈。而细读该文，我们将发现，他们皆深信自由民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系于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例如在宣言的结语，他们便声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做出‘那些关乎个体尊严及自主的最切身及个人的选择’。这种权利包括行使某些对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及时间的支配的权利。”

到了 1998 年，诺齐克被哈佛大学委任为“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是哈佛的最高荣誉，当时全校只有十七人享此殊荣。2001 年 10 月诺齐克出版了他最后的一本书《不变性：客观世界的基本结构》。这是一本深具野心之作，诺齐克意图另辟蹊径，对哲学中争议不休却无定论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自己一套解释。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真理？真理和客观性的关系如何？如何回应相对主义的挑战？意识(consciousness)和伦理的功能是什么？诺齐克运用了生物、物理、博弈论等各方面的知识，试图从宇宙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科学及伦理世界的客观性。

我这里只集中介绍一下他在伦理学上的新观点。诺齐克认为，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伦理规范的起源和基本功能是使人们互利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道德的根本作用是协调(coordination)。而道德之所以具普遍性，乃因为人们透过协调合作，从而共同得益的可能性是普遍存在的。但道德的具体内容，则要视乎个别社会互利合作的机会及条件而定。尽管如此，诺齐克还是提出了一条普遍性的伦理学核心原则：“它使得基于互利的最广泛的自愿合作成为强制性的；而且只有此是强制性的(mandatory)。”这条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鼓励任何促进人们自愿合作的次原则，另一方面它禁止任何非自愿性的合作。例如如果某一方参与合作的所得，反低于合作之前的所得，任何人便不可以强迫他们进行合作。诺齐克继而指出，这条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尊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spect)，它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生命及自主性，禁止谋杀及奴役他人，不得干预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等。

诺齐克强调这是最低度最基本的合作原则。他完全肯定在人类的伦理生活中，还有其他更高的道

德追求，例如对个人内在价值的肯定，对他人无私的关怀与爱，以至成圣成贤等。但他强调，在这些高层次的价值问题上，政府必须保持中立，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去到这里，诺齐克告诉我们，充分实践这种尊重伦理的，正是《无政府》中所论证的功能上最小的国家（minimal state）。只有市场，才能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合作；只有守夜人式的政府，才可以既保障我们互惠的合作，又不干预我们的个人自主。时隔二十七年，在他最后一本书的最后部分，诺齐克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为他第一本书的政治理想进行最后的辩护。

以上乃我对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的一些基本介绍。读者或会问，我们到底该如何总结诺齐克的一生？大多数的悼念文章，皆称其为当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有趣的是，诺齐克本人却十分抗拒这样的称号。事实上，我们见到他一生在知识论、形而上学、理性的性质、道德哲学以至人生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一如前说，诺齐克一生最欣赏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在他心目中，只有苏格拉底才称得上独一无二（the philosopher）。他后期的两本书《反省的人生》及《苏格拉底的困惑》更公开向这位希腊哲人致敬。诺齐克欣赏苏格拉底，最主要的是他那种将哲学完全融进生命的独特情调。如他所说：

苏格拉底展现了更丰富的一面：即那种不懈的探索所塑造的人格。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的，不纯然是探索真理的方法，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方法（及引导他的那些信条）。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活在他的探索中，活在他与别人的探索交往中。我们看到，探索的方式如何塑造了苏格拉底，渗透进他的生，他的死。苏格拉底是以身传教的，一如佛陀与耶稣。在哲学家中，只有苏格拉底如此实践哲学。

诺齐克对此衷心折服，并特别称此为一种“体现的方法”（method of embodiment）。我觉得，诺齐克一生治学，正正深受这种精神影响。他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诺齐克常常说，他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探索（exploration），而不是一种证明。探索总是向外敞开，充满各种可能性及冒险的乐趣。正如篇首的引文所说的一样，诺齐克的一生，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的一生。 ■

[【返回目录】](#)

林蔚昀：猴子轻柔的铁链声 | 从辛波丝卡的诗，看波兰百年来的历史难题

[林蔚昀 1982 年生，台北人。多年来致力在华语界推广波兰文学，于 2013 年获得波兰文化部颁发波兰文化功勋奖章。本文首发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博客来]



玛丽亚·维斯拉瓦·安娜·辛波丝卡

[Maria Wisława Anna Szymborska 1923.7.2—2012.2.1]

波兰诗人、翻译家,199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当今波兰最受欢迎的女诗人

我们的二十世纪本来应该比以前更好。

现在它已经来不及证明这一点了，

(.....)

发生了太多，

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

而那些本来应该到来的，

没有到来。

——〈在世纪的尾声〉

在 2016 年的今天读这首诗似乎有点遥远，毕竟我们不是处在世纪的尾声，而是世纪的开端。但

是，如果我们不把时间用线性、制式的方式分段，那么每一个时间点都是开端，也是尾声。

1918 年，波兰在亡国 123 年后重新建国，到 2018 年刚好满一百年。所以，说 2016 年是“复国百年”的尾声，完全不为过。或许现在正是个回望的好时机——我们可以透过辛波丝卡的几首诗，爬梳波兰这一百年的历史。

结束与开始 (1918-1939)

每场战争过后

必须有人打扫。

毕竟东西

不会自动归位。

——〈结束与开始〉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在《凡尔赛条约》的保障下建国，结束了被列强殖民统治的状态。然而，期待已久的浪漫复国美梦实现了，并不代表国家的问题就获得解决。亡国期间，波兰被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分成三份，等于是有着不同制度、文化、习俗、语言的三个国家。复国后，波兰人必须建立起共同的认同，同时以新主人的身分治理国家，面对战争造成的损伤、波兰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崭新、诡谲的国际情势。

眼前重重困难，波兰并没有时间和心力好好停下来“打扫”。建国初期，波兰为了国界问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及苏俄交战，直到 1922 年才尘埃落定。百年瓜分及长年战乱对社会体制及经济造成严重创伤，而 1929 年的大萧条则给波兰农民带来巨大冲击，造成大规模移民潮。此外，混乱的政治局势，军事统治、右翼壮大、反犹情结……所有的不利条件，都威胁着波兰的稳定发展。

即使一路走来颠簸困苦、阴影四伏，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还是曾建立起许多美好的事物，也有许多创新的尝试。战间 20 年是波兰文学最辉煌的年代之一，波兰当代的伟大作家如布鲁诺·舒兹 (Bruno Schulz)、贡布罗维奇 (Witold Gombrowicz)、维卡奇 (Witkacy)、米沃什 (Czesław Miłosz) 等人都在此时崭露头角，医生作家杰兰斯基 (Tadeusz Żeleński) 和女性主义者伊莲娜·柯基维慈卡 (Irena Krzywicka) 一同创立了波兰第一个“有意识的母亲”诊所，倡导性教育、避孕、女性身体自主权及女人对怀孕过程的决定权。另一位医生作家柯札克 (Janusz Korczak) 则投入为儿童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成立孤儿院，试图改善犹太及波兰孤儿的处境……

辛波丝卡在 1923 年出生，战间 20 年不是她积极参与的时代，但却是她的历史背景和童年。那是一个好坏相间、光影并存的年代——带着这样的童年，辛波丝卡和波兰共同迈入了充满风暴的青春期，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诗集封面

二次大战的战利品 (1939-1945)

我们的战利品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它是那么巨大，可以容身于握手，
那么困难，可用一个微笑来描述，
那么奇怪，象是在祷告词中古老真理的回音。
——〈无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从西方入侵波兰，对欧洲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紧接着在1939年9月17日，苏联亦从东方入侵波兰。华沙在9月28日投降，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效力下，波兰再次被瓜分，华沙以西归纳粹德国管辖，华沙以东则由苏联掌控。

纳粹占领期间，16岁的辛波丝卡去上地下学校，20岁时为了避免被纳粹强制送去德国劳动，她去了铁路局工作。布鲁诺·舒兹在一次犹太人屠杀中丧生。杰兰斯基在利维夫和20几名波兰学者及他们的家人一起被纳粹杀害。柯扎克和孤儿院的儿童们一起被送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维卡奇在听到苏联入侵波兰的消息时自杀。贡布罗维奇流亡阿根廷。年轻诗人巴青斯基（Krzysztof Kamil

Baczyński) 在华沙起义 (Powstanie warszawskie) 中战死.....整个景况就像波兰诗人费曹斯基 (Jerzy Ficowski) 在《比如说我》中写道的:「我的世代在年轻时就被射杀 / 余下 / 零星样品 / 比如说我」。根据统计,在二战中牺牲的波兰人约有 570 万人,其中包括在集中营中牺牲的波兰人及波兰籍的犹太人。

在波兰,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是敏感话题。确实,对犹太人及其他民族进行种族清洗的是纳粹,许多波兰人也在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如拯救了 2500 名犹太儿童的伊雷娜·森德勒 (Irena Sendlerowa)。但同一时间,1944 年在叶德瓦布内小镇 (Jedwabne) 也发生一群波兰人杀死 340 名犹太人的事件 (其中 300 人被烧死)。而在二战结束的隔年 (1946 年),在凯兹 (Kielce) 也有一群波兰人误信犹太人绑架小孩的流言,而杀死 37 名犹太人及 3 名波兰人——这起事件当地的民警和军队也有参与。

二次大战的战利品诚如辛波丝卡所言,是对这个世界的知识。而这知识的苦涩,不只当时的人品尝到了,后世的人也不断尝到它的余味和带来的后果。

时代的孩子 (1945-1989)

我们是时代的孩子,
这个时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所有你的、我们的、你们的
日常和夜间事务,
都是政治的事务。
——《时代的孩子》

二战过后,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年轻的辛波丝卡也曾经热情地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加入过波兰统一工人党 (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写下了许多表达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诗作。那时候,波兰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苏联对异议者的压迫和暴行还不是那么清楚,而且战后许多对西方失望的人,真心相信共产主义对波兰来说是一项救赎。后来,当知识分子们慢慢认清现实,许多人脱离或远离了共产主义,如辛波丝卡、米沃什。但是,也因为他们曾经为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效力,他们后来受到部分波兰人的批评。波兰的右派人士至今依然不认同辛波丝卡和米沃什,即使他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辛波丝卡曾写道:“我们是时代的孩子。”波兰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它在所有铁幕国家中,是最自由的,没有像匈牙利、罗马尼亚或是东德那样恐怖的暴政,但压迫仍是无所不在。波兰诗

人、剧作家鲁热维奇 (Tadeusz Rózewicz) 在他的剧本《证人或我们小小的稳定》(Swiadcowie albo nasza mała stabilizacja) 中就把这种表面平和、底下暗潮汹涌的状态描写得很传神。50 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结束，波兰稍微脱离了苏联控制，开始一连串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建，发展了轻工业，建了国宅，人们也有了洗衣机、电视、汽车。



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然而，在这一片繁荣稳定表象的背后，却是一个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的国家。人们和邻居朋友说话要小心不能透露太多私事，因为有可能被怀疑、通报、出卖。政府经常在印政治倡导品，然而人民要拿到足够自己使用的纸张（包括卫生纸）却难上加难。出版、演戏、出国都需要核准。在这种低压氛围中，人们只能藉由物质上的一点点享受来塑造一个「日子还没那么糟」的假象。但，这稳定也只是短暂的，禁不起物价飙涨、工资低廉，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考验。终于，执政党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大，最后在 1970 年 12 月爆发了民警向抗议的工人开枪，造成数十人殉难、千人受伤的血腥惨剧。至此，这梦一般的小小稳定于是正式宣告结束。

“先生女士们， / 这么渺小的脑袋无法预见未来 /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主人灭亡了。” 就像辛波丝卡在《恐龙遗骨》这首批评波兰人民共和国官僚系统的诗中所写道的，在 80 年代后期，波兰统一工人党

主导的政府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无法利用威权手段（甚至是戒严）压制人民的反抗。这样的政权会迈向崩溃，似乎也是必然。

猴子轻柔的铁链声（1989年后）

我正在考人类史，
我结结巴巴，挣扎着。

一只猴子，眼睛盯着我，讽刺地听着，
另一只似乎在打瞌睡——
而当问题提出我无言以对时，
他提示我，
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链声。
——〈布鲁各的两只猴子〉

1989年，波兰的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获得了胜利，这是波兰工人、教会、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解散，团结工联进入国会，华勒沙当选总统，波兰成为民主国家。波兰的成功造成了一连串东欧共产政权的瓦解，史称「东欧剧变」。赢得自由的波兰在90年代开始进行一连串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并且在2004年加入欧盟。在经济改革政策、市场自由开放、观光业蓬勃及欧盟的资金援助下，波兰的经济快速成长（波兰目前是欧盟第七大经济体），生活水平迎头赶上西欧国家，在欧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不过，看似蒸蒸日上的波兰依然面临着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均、弱势缺乏照顾、健保医疗系统功能不足、社会福利政策和薪资结构有缺陷、人口外流等问题。并不是所有波兰人都能享受到自由民主化带来的好处，相反的，许多人受到改变带来的冲击。当社会体系及政府提出的政策无法支持这些人，他们对现状的失望、不满及愤怒就会油然而生。这些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尊严受损的波兰人，很容易就将敌意投射到外来者（移民、难民）或外国（西欧国家、美国、俄罗斯、欧盟）身上，进而拥抱排他性的民族主义。2015年，宣扬波兰传统价值及民族主义、亲天主教、承诺照顾贫民、不信任欧盟、反对收容难民的右翼保守派“法律与正义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 Law and Justice）击败原本执政的中间偏右自由保守主义政党“公民议坛”（Platforma Obywatelska / Civic Platform），在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在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波兰陷入了反难民、反伊斯兰、反欧盟（因为欧盟要波兰接收难

民)、排外的浪潮之中。波兰政府目前接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非常少, 只有一些零星案例。然而, 自 2015 年 9 月开始, 波兰各地发生了一连串针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 这些事件的牺牲者多半是长期居住在波兰的移民或是短暂居留的外国人 (包括智利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乌克兰人)。这些事件在教宗来访前几个月有消退的趋势, 但是 2016 年 9 月开始, 波兰又出现了华沙地铁中有波兰人威胁亚洲女性, 还有华沙电车中有波兰教授因为和德国教授说德文, 而被波兰人殴打的事件。

回顾将近百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今天的问题 (如族群冲突、右翼壮大、排外、政经危机、认同危机、人口外流), 在波兰 1918 年建国的时就已存在。一百年来,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良好的解决, 也没有真正好好地被正视、面对。随着时间过去, 历史的重担于是愈来愈重, 也愈来愈难处理。令人不安的是, 许多欧洲国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如果欧洲持续右倾, 欧战的发生、甚至演变为世界大战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

历史的覆辙能避免吗? 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也许, 现今的波兰人 (或欧洲人, 或甚至全人类) 就像辛波丝卡在〈布鲁各的两只猴子〉中那个在考人类史, 不停结巴的「我」,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只猴子嘲讽地听着, 而在「我」沉默时, 另一只猴子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鍊声提醒。

或许, 猴子的铁鍊声可以让人类通过历史的考验。但是前提是, 也要能听懂那铁鍊声的提示才行。



[【返回目录】](#)

布罗茨基：怎样阅读一本书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 1940.5.24-1996.1.28, 俄裔美国诗人, 散文家, 荣获 198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本文为作者在意大利都灵首届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稿]



本文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这个一百年前尼采曾于此（这里指都灵）精神失常的城市里，关于图书博览会的这一念头本身就构成一个美丽的环。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麦比乌斯带（众所周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这次博览会上有好几个展台都被这位伟大的德国人的全集或选集所占据。就整体而言，无穷恰是这次出版交易活动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哪怕这仅仅因为它延续着一个已逝作者的存在，甚至超越了他本人的期望，抑或是它向一个活着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未来，我们大家全都乐于将这样的未来视为是永无止境的。

就整体而言，书籍的确比我们自己更能实现无穷。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它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较之于它们的写作者，它们占据着较小的物理空间。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了一把尘土之后，它们常常还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然而，这种形式的未来仍然胜过几个健在的亲戚或几个不能指望的朋友的怀念，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动机常常正是这种对身后意义的渴望。

因此，当我们将这些长方形的东西，这些八开、四开、十二开之类的东西传来传去的时候，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在用双手抚摸我们实在的或潜在的骨灰盒，我们是不会出大错的。说到底，用来写一本书——一部小说，一篇哲学论文，一本诗集，一部传记，或是一本惊险读物——的东西，最终仍只能是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好坏，它永远是有限的。有人说，理性的思考就是死亡的练习，这话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借助写作而变得更年轻。

同样，也无人能借助阅读变得更年轻。既然如此，我们自然总是倾向于选择好书的。然而，这样一个事实却构成一个悖论，即在文学中，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好”并非一个独立自在的范畴，因为它是由它与“坏”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于是，一个作家要想写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低级书刊，否则他就难以获得必需的标准。在最后的审判到来时，这也许能构成对于坏文学的最佳辩护；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参加的这项活动的存在意义。

既然我们全都是将死之身，既然读书费时甚多，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出一个系统来，可以使我们达到某种程度的效用最大化。当然，无可否认，我们在阅读一本大部头的、情节缓慢的平庸小说时也可能得到快乐；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可能同样欢乐地沉溺于时尚。最后，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因此，就需要简洁，需要压缩，需要融合——需要那些将人类各种各样的困境置于其最敏锐的焦点之中的作品；换句话说，就需要一条捷径。我们怀疑这样的捷径是否存在(它们是存在的，但此乃后话)，因此，作为这一怀疑的副产品，在现有印刷品的海洋中还需要某种罗盘。

罗盘的角色，当然是由文学批评、由评论来扮演的。唉，这罗盘的指针摆幅很大。时而北方，时而南方(确切地说是南美)，时而是其他方向；对于东方和西方来说也是一样，其摆幅甚至更大。一个评论家带来的麻烦(至少)有三重：一，他有可能是一个雇佣文人，像我们大家一样无知无识；二，他可能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持有强烈的偏爱，或者干脆与出版业一同去牟取私利；三，如果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就会使他的评论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于是，你就止于阅读这些评论而不会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那海洋上，四面八方都有书页在沙沙作响，你紧抓着一只你对其浮力并不太信赖的木筏。因此，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去发展你自己的趣味，去构造你自己的罗盘，去使你自己熟悉那些特定的星星和星座，它们无论暗淡还是明亮，却总是遥远的。

然而这需要大量时间，你会轻易地发现自己年岁已老，头发花白，腋下夹着一本糟糕的书正向出口走去。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也许仅仅是同一方案的一个部分，就是去依赖传闻：朋友的一个建议，你偶然喜欢上的文本中的一个提示。这种做法尽管还没有被以任何形式制度化(这倒不会是一个太糟的主意)，它却是我们大家自幼年起就非常熟悉的。然而，这最终仍只是一个可怜的保险，因为现成文学的海洋是波涛汹涌的，是不断扩展的，就像这场图书博览会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它本身就是

那片海洋中的又一场风暴。

因此，哪儿才是我们的陆地(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座不宜居住的岛屿)? 哪儿才有我们的好人星期五呢(更甭提一头猎豹了)?

在我要提出建议之前——不! 我所提出的并非建议，而仅仅是一个用来培养健康文学趣味的方案——我想对它的来源，亦即我卑贱的自我说上几句，这并非出自我个人的自负，而是因为我相信，一种思想的价值是与其出现的背景相关联的。说真的，如果我是一个出版家，我就会在我所出书籍的封面上不仅写上作者的姓名，还要标明作者写作每本书时的准确年龄，以便让那些书籍的读者们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去思考一个比他们年轻得多或是年老得多的人所写书籍中的信息或观点。

我的建议源于这样一类人(唉，我无法再使用“一代人”这样一个词了，这个词具有民众和整体的特定含义)，对于他们来说，文学永远是一种带有上百个名称的东西；这类人的社交风度会让鲁滨孙·克鲁索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皱起眉头)，甚至会让人猿泰山皱起眉头；这类人在大的集会上感到不自在，在晚会上从不跳舞，常常要为通奸找出形而上的理由，在讨论政治时非常注重细节；这类人远比他们的诋毁者更不喜欢他们自己；这类人仍然认为酒精和烟草胜过海洛因或大麻；这些人，用温·休·奥登的话来说就是：“你在街垒中找不到他们，他们从不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情人开枪。”如果这类人偶然发现自己的鲜血在牢房的地上流淌，或是偶然发现自己在台上演讲，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某些具体的非正义的反对者，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反抗者(更确切地说的不赞成者)。他们对他们所提出观点的客观性不存幻想；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坚持着他们不可原谅的主观性。然而，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并不在于使自己摆脱可能遭遇的攻击：通常而言，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其观点及其所坚守立场的脆弱性。而且，采用一种与进化论者相反的姿态，他们将那脆弱性视为生物的首要特征。

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与其说是缘于如今几乎每个写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的那种受虐狂倾向，不如说是缘于他们本能的、常常是第一手的知识，即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陈词滥调。对陈词滥调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想要说的话的背景，我也就可以将那话直接道出了：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或小说艺术中。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

代品、在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突降法，一种从崇高主题突然降至平淡或荒诞语气的修辞手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我并不想批驳散文。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不过是恰好比散文年长，并因此走过了更长的路程。文学始自诗歌，始自游牧者的歌，这游牧者的歌要早于定居者的文字涂鸦。虽然我曾在—个地方将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比作空军和步兵的区别，但我此刻提出的建议却不是划分等级或弄清文学的人类学起源。我想做的一切就是干点实事，使你们的视线和脑细胞摆脱那许多无用的印刷品。人们可以说，诗歌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因为它就是高效的同义词。

因此，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对我们两千年的文明进程进行概括，尽管是以微缩的方式。这比你们想象得要简单些，因为，一首诗远不如一部散文那样冗长。还有，如果你们所关注的主要为当代文学，你们的任务就真的很轻松了。你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花上两个月的时间，用你们几位母语诗人的作品将自己武装起来，最好是从本世纪上半期的诗人读起。我估计，只需读上一打薄薄的书，你们就可以完成任务，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你们就能像模像样了。

如果你们的母语是英语，我可以向你们推荐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叶芝、T.S.艾略特、温·休·奥登、玛丽安娜·穆尔和伊丽莎白·毕晓普。如果你们的母语是德语，我推荐的是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乔治·特拉克尔、彼得·胡赫尔和戈特弗里德·贝恩。如果你们的母语为西班牙语，那就是安东尼奥·马查多、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刘易斯·谢尔努达、拉斐尔·阿尔维蒂、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和奥克维塔奥·帕斯。如果你们的母语是波兰语，或者，如果你们懂波兰语的话(这将成为你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本世纪最非凡的诗歌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我则乐于向你提起列奥波尔德·斯塔夫、切斯拉夫·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尔伯特和维斯拉瓦·辛姆博尔斯卡。如果你们的母语是法语，那么当然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儒勒·苏佩维埃尔、皮埃尔·勒韦耳迪、布莱斯·辛德拉斯、保尔·艾吕雅的一些作品，阿拉贡的少许东西，以及维克多·谢加仑和亨利·米恰尔。如果母语是希腊语，你们就应该读—读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乔治·塞菲里斯和雅尼斯·里特索斯。如果你们的母语为荷兰语，那就应该是马丁努斯·尼约赫夫，尤其是他令人震惊的《阿瓦特》。如果母语是葡萄牙语，你们就应该读费尔南多·佩索亚，也许还应该读—读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如果母语为瑞典语，就请读圭纳·埃克路夫、哈里·马丁逊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如果母语为俄语，那么至少可以说，要读—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安娜·阿赫马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克留耶夫。如果母语为意大利语，我不想冒昧地向在座的各位提供任何名单，假如我提起了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和蒙塔莱，这仅仅是因为我早就想向这四位伟大的诗人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诗句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能够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对他们表达感激，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你们读完了上述这些人中任何一位的作品之后，你就会把从书架上取下来的一本散文搁在一边，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能继续阅读那本散文，那么这就应该归功于其作者了；这就意味着，那位作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诗人一样，对我们的存在之真理的确有某些补充；这至少表明，那位作者不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语言具有独立的力量或优雅。还有，这就意味着，阅读成了你们难以遏制的嗜好。说到嗜好，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

请允许我在此给出一幅漫画，因为漫画能突出精髓。在这幅漫画中，我们看到一位读者，他的两只手上都捧着翻开的书。他的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散文。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会首先搁下哪一本书。当然，他也有可能两手都拿着散文，但这将给他以自我否定的标准。当然，他会问道，什么是好诗和坏诗的区别，如何能保证他左手上的书的确是值得费神一读的。

好吧，首先，他左手上拿着的书十有八九会比他右手上的书更轻。其次，诗歌，如蒙塔莱所言，注定是一门语义的艺术，江湖骗子们在其中的机会非常之少。读到第三行，一位读者就能明白他左手上拿着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诗歌能很快地产生感觉，其中的语言特性能立即让人感觉出来。三行之后，他可以瞥一眼他右手上的那本书了。

正如我对你们说明的那样，这是一幅漫画。可与此同时我也相信，这也可能构成一种姿态，在这届图书博览会上，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地采取这样的姿态。至少，你们要确信你们手上的书籍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当然，让眼珠从左边转向右边确实是一个诱发疯狂的计划；不过，都灵的大街上再也没有马夫了，在你们离开这片会场的时候，再没有马车夫鞭打马儿的景象来使你们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了。另外，一百年过去了，再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失常能对民众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些民众的数量将超过这届图书博览会上所有书籍中黑色小字母的总和。因此，你们最好来试一试我刚刚推荐的那个小把戏。 ■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 年 3 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 年 3 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 年 4 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 年 9 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 年 10 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 2015 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 万元（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9-2020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